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十四

最具影响力的
思想先驱

(下册)

邢春茹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邢春茹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7.3

ISBN 978 - 7 - 80711 - 716 - 2

I. 影... II. 邢... III. 名人 - 列传 - 世界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743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960 千字 印张：110

责编：于文海 陈晓玉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6.00 元（全 20 册）

前 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心里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

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0册，包括《中国文学发展概论》、《中国文学大家》、《中国文学精品》、《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古代文学大家》、《世界古代文学精品》、《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西欧现代文学大家》、《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中欧现代文学大家》、《俄苏现代文学大家》、《美洲现代文学大家》、《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西欧现代文学精品》、《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俄苏现代文学精品》、《美洲现代文学精品》、《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

本书由萧枫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目 录

本杰明·富兰克林	1
大卫·休谟	6
让·雅克·卢梭	9
德尼·狄德罗	12
亚当·斯密	14
伊曼努尔·康德	18
托马斯·潘恩	21
杰瑞米·边沁	24
丹 东	26
圣西门	29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32
罗伯特·欧文	36
约翰·赫尔巴特	39
阿图尔·叔本华	42
托马斯·杰斐逊	45
阿·德·托克维尔	50
约翰·斯·穆勒	53
亚伯拉罕·林肯	57
亚历山大·赫尔岑	62
卡尔·马克思	6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70
查理·达尔文	73
车尔尼雪夫斯基	77
福泽谕吉	80

威廉·詹姆士	84
弗里德里希·尼采	86
严复	8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90
康有为	93
亨利·帕格森	95
马克斯·韦伯	98
孙中山	100
蔡元培	102
弗·伊里奇·列宁	104
伯兰特·罗素	108
塞缪尔·P·亨廷顿	110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13
约翰·梅·凯恩斯	118
马丁·海德格尔	122
路德维奇·维特根斯坦	125
让·保罗·萨特	128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130
丹尼尔·贝尔	133
米歇尔·福柯	138

本杰明·富兰克林

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著名的科学家、资产阶级思想家及伟大的爱国者。

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06年1月17日生于北美新英格兰波士顿一个制造蜡烛和肥皂的手工业者家里。

富兰克林从小就喜欢读书，八岁时被送进文法中学学习。他在文法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庭负担很重，十岁时，不得不离开学校。

富兰克林在他父亲的蜡烛肥皂店里工作了两年。后来又跟哥哥詹姆士·富兰克林学印刷。在九年的学徒工期间，他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一定的印刷技术，成为他哥哥的得力助手，而且还读了许多书，结识了一些藏书爱好者。十四岁时，富兰克林开始练习写作，取得了极大的成绩。1721年起，富兰克林常常匿名为他哥哥的报纸《新英格兰报》撰稿，较受欢迎。另外他还学习了算术、几何学、英文文法、以及《苏格拉底回忆录》等方面的书籍。

1723年，十七岁的富兰克林离开印刷所到费城去谋生。几经周折后，他在一家印刷所当上了正式的印刷工人。

1724年，富兰克林因轻信别人，只身来到伦敦，处境极为困难。他只能靠自己的印刷手艺，在伦敦的一家印刷所找到了职业。

1726年10月，富兰克林回到费城重操印刷旧业，借此机会认识了新泽西州的许多当权人物，并开始了他早期的社会政治活动。

1730年，富兰克林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宾夕法尼亚报》，这份报纸印刷很好，他所写的论文又颇能吸引读者，销路日广。

这份报纸一直出版到 1748 年，使富兰克林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富兰克林还创办了一个图书馆，这是北美图书馆之母，在普及文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732 年，富兰克林开始出版一种历书，名为《致富之路》。它是一种特殊的历书，其中印有天文知识、经济问题和生活问题等各种知识，也有文艺作品、轻松的诗歌和笑话。这种既有用又有趣的历书一共发行了二十五年，每年一册，风行于美洲、欧洲等地。

1736 年，他正式参加政治活动，被聘为宾州议会秘书，一直到 1751 年。1737 年，美洲邮务总长聘他任费城邮政局长。为了教育当地青年，他于 1743 年开始发起组织“美洲哲学会”。到 1751 年，“美洲哲学会”发展成为美国的首批大学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为美国的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此外，他还创办了不少公共事业。1737 年，他在费城创办了救火队，这在美国也是创举。1751 年，他又用募捐的办法办了一所公共医院。自 1753 年到 1775 年期间，他任美洲副邮务总长，他注意降低邮费，加速邮递，对美洲邮政大有改进。

从 1746 ~ 1754 年的几年时间，富兰克林广泛地从事科学研究。他研究的成果，为自然科学特别是电学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人类科学文化的宝藏中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17 世纪电学还很落后，电学实验还只限于毛皮摩擦火漆棒、电能发生火花、人受电后感到震动等几种。

富兰克林深深懂得，只有经过缜密的实验，才能为认识自然提供可靠的根据。于是他开始了研究静电的实验工作。

富兰克林是做物理实验的能手，又善于从许多问题中抓住关键性的问题。他的电学实验首先从莱顿瓶开始，得出了极为重要的结论。如“电火花并不是由摩擦而产生的，电是一种在物质中弥漫着的、不能为其他物质特别是水和金属所吸引的基本要素”……富兰克林所得出的结论，为 19 世纪法拉第在电介质上所做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富兰克林还把莱顿瓶内外两面的电荷定名为阳电与阴电，并用正号和负号表示。这在电学上还是创举。自从有阳电阴电之分

后，就使电学开始走向准确的定性的方向，他对莱顿瓶的研究使科学界正确地认识了它的作用，并认识了绝缘体在电学中的重要性。1788年法国科学家库伦发现电荷间相互作用力的有名定律就是从富兰克林这一概念出发的。这是富兰克林在电学上的一大贡献。

在大气电学方面，富兰克林也是一个先驱者。他第一个发现雷电是由电造成的。富兰克林通过风筝吸引雷电的著名实验证明了：雷电是自然界的自然现象之一，是大气中的强烈放电现象，其原理类似莱顿瓶中的放电。

富兰克林的发现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全世界科学家的重视，这对人类认识自然和控制自然是一个极大的成就。富兰克林在这个实验以后，创造了避雷针，造福了人类。这充分说明了电学研究第一次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切关系。

此外，富兰克林在气象学、生物学、地质学、化学、农学和数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特别是在数学的“幻方”发展史上他创造了八次和十六次两种幻方。

由于在科学研究上的辛勤劳动和辉煌成就，富兰克林于1753年同时获得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授给他的荣誉硕士学位。1752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爱丁堡大学、圣安德鲁大学和牛津大学都先后赠给他博士学位。

富兰克林是当时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同当时欧洲许多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都有直接往来。

富兰克林在哲学观点上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一方面承认上帝的存在，承认上帝创造了自然界；一面又认为当自然界被创造出来以后，自然界就是服从它本身内在规律的一种实在性东西。这就是他的世界观。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他是唯物主义的。

富兰克林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很有贡献。他认识到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富兰克林还正确地认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马克思在讲到研究各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的重要意义时，就引用了富兰克林这个关于人的精确定义。

富兰克林的唯心主义社会观比较明显地表现在对宗教的看法

上。他一再表明，他只反对英国圣公会和天主教，并认为宗教是“必要的”。

富兰克林热爱自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他认为以侵略和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是罪大恶极的蠢事。他痛恨种族主义，反对奴隶制度，提出要建立所谓“特殊社会”，一切“都应该享受平等的自由和幸福的权利”的社会。

在政治观点上，富兰克林具有天赋人权的思想，他把洛克的“生活、自由、私有制”的公式作为自己搞政治活动的指南针。

从17世纪初期开始，英国通过一系列的殖民活动，在美洲东海岸先后建立了13个殖民地。到18世纪50年代，北美殖民地人民同英国殖民者的矛盾日益尖锐，英法等殖民者争夺美洲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富兰克林出于对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考虑，他的活动不得不转到政治斗争上来。

1750年，富兰克林被选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员。他参加了当时的反业主党，成为议会反业主党的领袖。1757年，宾夕法尼亚议会为制止业主和总督的不法行为，派富兰克林到伦敦去向英王请愿，由于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谈判形成拖延局面。富兰克林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殖民制度的罪恶。他的言论引起了广泛注意。这迫使宾夕法尼亚的业主们主动做了让步。

1762年，富兰克林回到美洲。1764年，为请求英王保护殖民地的权利，宾夕法尼亚议会又派他去伦敦，但英王及其政府一意孤行。1770年3月5日，发生了波士顿人民因反对《唐德森税法》而惨遭英军屠杀的“波士顿惨案。”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压迫政策，使富兰克林触目惊心。

1775年5月5日，富兰克林从英国回到费城，担任宾夕法尼亚法治委员会主席，负责组织义勇军，采办军火，发行军需公债，用武力保卫宾夕法尼亚。同时他还是宾夕法尼亚议会主席，和潘恩共同起草了宾夕法尼亚宪法。宾夕法尼亚议会派他出席了1776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

1776年7月4日，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殖民地与英国分离，建立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富兰克林参加

了宣言起草工作。

为了争取国际援助，1775年11月，大陆会议成立了一个由富兰克林为首的秘书委员会（即后来的外交委员会）。1776年12月，大陆会议派富兰克林前往巴黎，向法国外交部递送正式外交照会，提议同法国订立商务条约和同盟条约，促使法国参加反英战争。尽管法国舆论一致主张援美，但法国政府却是动摇的，富兰克林的使命极其艰巨。

1777年10月，英将柏高英在纽约的萨拉托加战败投降。1777年12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发表声明：准备承认北美政府和法国政府签订的《美法友好商务条约》和《美法同盟条约》。富兰克林的努力最后取得了成就。同年6月，英法两国不宣而战。1780年，法国的远征军抵达北美参战。富兰克林出使法国的外交成就，对北美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美国独立战争以美国人取得最后胜利而结束。1787年6月，大陆会议派遣著名人物约翰·亚当斯、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等三人为和谈代表，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约最后在巴黎签订，英国正式承认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

1785年7月，富兰克林取道英国回美国，立刻被宾西法尼亚选为州长。他接连四年担任宾州州长职务，在州长任期内，他采取了许多政治统一的措施，改变了宾州的外境；举办了一些有利资本主义发展的公共事业；大力发展了他一手创办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用以培养该地青年。

1787年5月到9月，美国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制定美国宪法，八十一岁的富兰克林仍以宾州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富兰克林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美国宪法中的两院制，就是他为了调和各州的争执而提出的建议。1788年以后，富兰克林不再担任政府官职了。

1790年4月17日，这位美国爱国者、科学家、资产阶级思想家与世长辞了，他为新兴的美国资产阶级的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卫·休谟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1723年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希腊语，后又学习法律，但他热爱学习和研究哲学。1735—1737年旅居法国。1746和1747年两度担任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并随他出使维也纳和都灵。约在1750年间与斯密结识后成为密友。1752年出任爱丁堡律师协会图书馆馆长。1763年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后任参赞，与巴黎思想界著名人士和重农学派来往密切。1767年任英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1769年休谟隐居于爱丁堡。

休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1739～1740）、《道德与政治论文集》（1741～1742）、《政治论丛》（1752）、《英格兰史》（1754～1762）、《经济学文集》（E. 罗德温编，1755）。

休谟曾经对经济动机或者说“劳动的原因”进行过研究。这是他的经济分析最基本的层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经济思想和他在《人性论》中对人性的探讨之间的联系。休谟认为有四种“劳动的原因”：消费的欲望，行动的欲望，快乐的欲望及获得的欲望。消费的欲望得到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行动的欲望主要指胜任挑战性工作的欲望，特别是商人的活动，以及更一般地说，“勤劳的职业”，符合这样的要求。快乐的欲望主要指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但这不是劳动的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因，但却是消费和有兴趣的活动的共同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动的最后原因是获得金钱的欲望，即积累在经济“赌博”中对获胜的欲望。休谟着重指出这些动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认为除了寻求快乐之外，人们还受许多“本能”驱使去干一些为干而干的事情，从而排除了把财富和福利简单等同，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

会的肯定埋下伏笔。

休谟对政治经济学，或者说市场关系进行过研究。客观地讲，这一部分是其经济理论研究中价值相对较小的部分。休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是 18 世纪货币数量论的著名代表。休谟与重商主义观点相对立，主张货币数量论，他否认货币具有内在的价值，在他看来货币不过是劳动和商品的代表，是决定价格的手段；商品价格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成比例地上涨。休谟这一观点是依据欧洲 16—17 世纪的情况提出的，由于当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黄金大量流入欧洲，货币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物价上涨的情况。当然，由于他不懂得价值，不懂得货币本身也有价值，所以，没有看到商品价格不是由货币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关系所决定的。休谟不知道在使用金属货币时，商品价格的提高是由于金银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相比发生了变化。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而是由于美洲开采黄金的费用低廉，输入欧洲的黄金价值下降了。不过后来货币数量论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解释纸币管理的理论依据，至今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仍是沿着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发展起来的。

其次，他运用古典的货币数量论的分析方法，成功地解决了重商主义的贸易收支自动平衡趋势和利用外贸顺差积累金银政策主张之间的悖论。他的立场是，由于硬币流通对贸易国的物价影响，每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会在进出口相等时趋于均衡。由此可见，能决定一国吸引并保持货币数量的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由其人口及其人民勤劳精神决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该国的贸易顺差。

第三，攻击了重商主义者关于利率是由货币供给量决定的观点，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站在数量论的立场上指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会简单地提高所有价格而必然抵消为开支融资而增加的对贷款需求，使利率不受影响。因此，决定利率的是真实资本供给。在这里休谟转向自然的历史研究方法。

第四，休谟还探讨了政府管制市场的消极后果，尤其认为自由贸易对于所有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应该有显著的有利影响，因此，任何伴随的代价（属于短期性质）都是值得承受的。

第五，休谟认为为了保持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适度的税收规模。休谟一方面赞同重商主义学派关于“贫困的效用”理论，认为增加税收“会成比例增加人们的勤劳”，另一方面他强调，由于经济活动也受消费欲望的驱使，获得消费目标的困难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会导致失望。从税收对勤劳刺激效果考察，应该存在最优税收水平。

在休谟的经济哲学中，他曾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场上，对商业的和工业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休谟运用的道德判断标准是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中提取的。休谟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前三种动机，即消费、有兴趣的行动和快乐的欲望，是个人幸福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有助于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且最终有助于人类福利的整体改进。此外，休谟认为，经济增长还有利于许多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如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和机械论的知识的艺术的增长，以及培养人性和同情意识；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并且，通过对知识和同情意识的增加的影响，推进对政治艺术与政治和谐的理解。

在分配理论方面，休谟作为 18 世纪的经济学家已不同于 17 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再由地租引出对利息的说明，而是把利息和利润联系起来。他认为利息和利润存在相互影响，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但他没有明确指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他揭示了利息率发展趋势，认为利息率低是经济发达的标志。

让·雅克·卢梭

让·雅克·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反封建的勇敢战士，又是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

卢梭 1712 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他的高祖父因改信基督教新教遭到迫害，于 16 世纪中叶流亡到日内瓦定居。他的父亲是个贫穷的钟表匠，母亲在生下卢梭几天后就去世了。因为家境贫寒，卢梭小时候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系统教育，他渊博的知识都是依靠自学获得的。

10 岁时，卢梭被寄养在一个牧师家里，在那里他学会了拉丁文。两年后，卢梭在一个公证人家里当仆人，后来又跟着一个雕刻匠作学徒。因为不堪虐待，两年后卢梭逃离了这个难以忍受的地方，从此开始过颠沛流离、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16 岁时卢梭流浪到萨瓦，投奔华伦夫人。在华伦夫人的帮助下，卢梭来到都尼。在那里，卢梭改信天主教，并得到一小笔钱。此后为了生活，卢梭当过雕刻匠、仆人和音乐教师。最后在没有办法了，卢梭于 1730 年再次回到富有的华伦夫人身边，依靠她生活了 10 年。

1740 年，卢梭只身来到里昂，在那里做家庭教师。经过长期勤奋的自学和个人奋斗，卢梭已经掌握了丰富的知识，他所从事的职业也从最初的打杂转变到此时的靠知识谋生。

1742 年，卢梭来到巴黎，开始并没有什么收获，直到 1743 年秋，才在一位贵妇人帮助下任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卸任回到巴黎后，卢梭又从事了一段时间的音乐、戏剧和舞剧的创作，但是没取得什么成就。

1749 年第戎科学院以《科学与艺术的进步能使道德改善，还是使道德堕落》为题悬赏征文。卢梭于 1750 年以《论科学与艺

术》一文应征。在这篇论文中，卢梭坚决地反对社会上的不平等，反对贵族和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反对封建社会的文化。这篇论文获得第一名，卢梭也由此成为哲学界的著名人物。1752年，卢梭创作了歌剧《乡村魔术师》，上演后获得极大成功，法王路易十五授予他一笔年金，但是被卢梭拒绝了。卢梭放弃对财产和声誉的要求，以便让自己永远保持贫困和独立。

卢梭的第二篇专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于1755年初发表了。这篇文章所阐述的思想基本是对第一篇征文的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私有制使社会出现贫富对立，使人类失去了天赋的自由和平等，发展到极至便是专制制度，人民有权利反抗专制君主。

在这之后，卢梭患了一种受迫害的妄想症，使他的身心不时受到严重折磨。然而在1761~1762年间，他却完成了三部最主要的著作：哲理小说《新爱洛绮丝》和《爱弥儿》，论著《民约论》（也译《社会契约论》）。在这些著作中，他对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和封建的奴役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系统阐述了“天赋人权”的政治主张。

《民约论》和《爱弥儿》的出版，给卢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两部著作中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神学家的抨击，激起了政府当局和教会人士的极大愤怒。法院下令通缉卢梭，卢梭的这两部著作在巴黎被当众焚毁，卢梭被迫逃往国外。在逃亡中，又有人发表小册子，对卢梭本人的个人生活和道德品行进行人身攻击。卢梭怀着满腔悲愤撰写了自己的自传《忏悔录》及其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

1766年，卢梭接受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到达伦敦，这期间他所患的妄想症严重折磨着他的精神。翌年，他获准重返法国，化名勒奴。1770年，法国政府宣布对卢梭的赦免，卢梭于是迁往巴黎。1778年7月2日，这位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与世长辞，终年66岁。

卢梭的一生经历极其坎坷，但是他的光辉的思想却照亮了整个一个时代。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在政治上，他的反封

建、反专制的精神影响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传统；他的文学创作也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同样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许多作家。

德尼·狄德罗

德尼·狄德罗，1713年出生在法国朗格尔城。狄德罗11岁时被送进了郎格尔天主教耶稣会中学。在耶稣会学校的4年里，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1726年8月23日，13岁的狄德罗当了神甫。老神甫很满意他。本来狄德罗是有可能成为教会高级官员的，可是狄德罗却说：“我宁愿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哲学家。”

狄德罗酷爱书籍，一次，他在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他一打开这本书，就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傍晚书店关门，他才被店员说服离开了书店。狄德罗走到街上，一面走一面继续读书。完全沉浸在热烈的激情之中。

他站在滚滚的塞纳河边对着伏尔泰的书暗暗发誓，他要为自己的祖国奋斗一生。

1742年1月的一个夜晚，狄德罗跟着一位朋友来到“摄政”咖啡馆，认识了卢梭，两人成为好朋友。

1742年，狄德罗结婚成了家，同时翻译了斯塔尼安的3卷《希腊史》；又同另外两位作者合译了罗伯特·詹姆斯的《医学辞典》。这部辞典1743年在英国分3卷出版，译本分6卷出版。

1746年，狄德罗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哲学思想录》。这本书以随感的形式，论证天主教关于上帝迷信理论的荒谬性，具有明显反封建、反宗教的倾向。

一年后，狄德罗又写成宣传无神论的《怀疑论者的漫步》，1749年，他写了著名的《论盲人书简》，此书大大触怒了统治者，惹来了一场灾难。

1751年《大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后，它的意义很快就为人

们所理解。伏尔泰称赞：《大百科全书》这项事业将是法国的光荣和它的非难者的耻辱。而狄德罗正在给这部巨著不时增砖添瓦。在这些“砖瓦”当中，就有他写的那个著名条目“智慧”。

《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和出版，形成了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高潮。狄德罗在自己的哲学论著《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关于物质运动的哲学原理》中，看到了物质是第一性的，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接近了近现代唯物主义的观点。

狄德罗在文学艺术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狄德罗的美学思想，贯穿了唯物主义的精神。他反对“纯艺术”，坚持“美”和“真”的联系。在文艺理论中，他运用唯物主义的原则。提出了艺术美在于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论，他还号召作家到农民茅舍里去寻找题材，主张用流利的日常语言而不用典雅的诗句来表现市民的生活。

狄德罗是法国 18 世纪杰出的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恩格斯称赞他是“为了对真理和正义而热诚地献出了整个生命的人”。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英国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1723年6月5日出生于苏格兰的柯卡尔迪。斯密从小勤奋好学，14岁进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深受苏格兰哲学家F·哈奇森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1740年毕业时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获斯内尔奖学金，就学于牛津大学的巴利澳尔学院，直到1746年毕业。1748—1751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纯文学及法学，有一个时期还兼讲经济学。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与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D·休谟相识，并结为挚友。1751～1763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先后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政治经济学），并曾一度兼任副校长等职。在此期间，还积极参加经济学、文学、哲学等各种社会学术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759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6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764年2月辞去教授职务，转任年轻的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他去欧洲大陆旅行近三年。此间，在瑞士和巴黎见过F·M伏尔泰、C·A爱尔维修、J·凡达朗培尔、P·魁奈、A·R·J·杜尔哥等许多名流学者，同时开始着手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写作。1766年10月返回英国，1767年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回国后，因从巴克勒公爵那里获得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得以在家乡闭门写作。经过10年的努力，1776年3月出版了自己的主要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博得了资产阶级的普遍赞扬，斯密的名声也随之大震，以至英国政府首相小彼得都拜他为师，

后来资产阶级学者也把他当做政治经济学之父来推崇。

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海关税务专员，定居于爱丁堡，并继续研究和写作。1787年11月和1788年11月又两次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每次任期一年），1790年7月17日去世。

斯密一生写过十几种有关社会科学的著作，但生前只出版《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其余书稿大都在临终前由他一再敦促其挚友焚毁了。他去世后，由后人给他编辑或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哲学论文集》（1795）、《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军入及军备的演讲》（1896）、《亚当·斯密论美国革命》（1933）、《1762—1763，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有关修辞学和文学的讲稿》（1963）、《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六卷本）（1975—1980）。

斯密的体系把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独特形式的自然神学论与狭义的经济思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其中，他的经济理论又牢固地置于伦理哲学与历史的框架之中。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观和社会秩序观，构成了其中经济学的社会学基础。

在斯密看来，人类的行为是由六种自然的动机所推动的：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这些动机经过各种社会机制的细致平衡，会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至于与其他人的出现强烈地对立，由此而产生的自利行动必然在个人的利益追求中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由于深信人类动机的自然平衡和对自然秩序的信仰，斯密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他的经济学理论正是以这种基本观点为基础而对经济过程作出分析的。

斯密对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其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的，从而形成一个用来说明市场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本质（包括适应这种制度的经济政策）的完整经济学体系。

在微观经济学方面，他的价值论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并且把每一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视为是衡量交换价值的

尺度，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考察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竞争约束个人自利行为的作用形式和价格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运动过程。他的分配理论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决定，并考察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利润是雇佣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但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利润率将趋于下降；至于地租，则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垄断权而获得的一种收入。但是，当他力图把价值论与分配论结合在一起时，斯密的论述有不少混乱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成为后来的学者各取所需的源泉。

在宏观方面，斯密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动态变化过程：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近代社会的经济不断发展？按照他的分析，这部分地可归因于市场机制本身，因为，市场在鼓励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自然地触发出他们的勤劳、节俭品质和创造精神，并通过竞争的力量，引导人们把其资源投向生产率最高的经济领域，从而促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基本的力量，那就是以劳动分工为主要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生产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因此，他一方面详细分析了分工如何导致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时间的节约和技术进步，并进而考察分工发展的条件，提出“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著名论点；另一方面考察了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对生产性就业量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资本积累的源泉——节俭和储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奉为经典。

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他期望在自律的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社会经济秩序，因而倡导一种“自然的、简单明了的自由体系”。在其中，政府只需维持和平，建立和维持一个严密的执法体制，以及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可以放心地让每一个人有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他自然地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

斯密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体系，虽然其间缺

乏严密的逻辑以及存在各种矛盾，但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几乎从他还在世时开始，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其他学者都力图使斯密的思想适应其某种体系或时尚。每一代人和每一个经济学派都在寻找“自己的亚当·斯密”，且总能如愿以偿。因此，把他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著作永远不失为经济学的经典。

伊曼努尔·康德

伊曼纽尔·康德 1724 年 4 月 22 日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家庭，父亲是一个马鞍匠。16 岁到 21 岁在哥尼斯堡大学学习哲学，毕业后曾在一个伯爵家里做过四年家庭教师。后在哥尼斯堡大学做了 15 年的讲师，16 年的教授以及 11 年的校长，73 岁时辞去教职，1804 年 2 月 12 日以 80 高龄病逝。据说去世时的康德已经枯瘦如木乃伊。

在康德的墓碑上铭刻下的这样一段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段话出自三大批判之一的《实践理性批判》的最后一章。这段话可以作为人们理解康德哲学的要旨，因为它告诉我们康德哲学的两大主题——自然和自由。

康德所处的时代，主要的哲学问题在于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争论。对康德有重大影响的卢梭以激烈的方式突出了自然、自由与文明、进步之间的矛盾，促使宣扬理性万能的启蒙运动开始进行反思。而作为哲学核心部门的形而上学也在休谟的怀疑论和法国唯物主义的攻击下名存实亡了。康德体现了试图弥合两者观点的努力。他既对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提出人的认识论的局限性问题，又具备一种形而上学的情怀，以力图克服当时存在的一股虚无主义。

在康德划时代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哲学问题归结为三个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

所谓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针对传统的认识论的主客关系来说的。康德之前的认识论认为，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对象作为客体外在于人，主客体二者是对立的，借助于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和征服外部世界能力的不断提高，启蒙运动以来所宣扬的人的理性逐渐被置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万能的地位之上，理性和科学被神话成为新的上帝的意志，而有血有肉的人，则面临着价值虚无主义的威胁。康德极具前瞻性的预见到科学理性的发扬并不能证明人的价值和尊严，当世界被必然性所笼罩，人也就失去了自由。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颠倒了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客体围绕着主体转，而是主体围绕着客体转，据此康德将理性区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后者即指科学理性，前者则是人的先天的道德律令。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限制理性的认识能力，突出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从而为人的道德信仰留出地盘。因为只有将形而上学的对象从理论理性的认识领域转移到实践理性的道德领域，才能以道德实现自由，在康德看来，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他同时是自然存在物和理性存在物，身受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两种法则的影响。

康德也不同意经验论者，他认为知识是人类同时通过感官与理性得到的，经验对知识的产生固然必要，但绝不是唯一的途径，把经验转化为知识就需要理性（这里的理性指的是天赋的一种能力，康德称之为范畴）。

经历了少年时的狂飙突进，到中年时建立了一个知、行、意合一的完整的哲学体系，老年的康德致力于考察一个合理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尤其是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康德更是看到了这个历史的、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的迫切性，因而把晚年精力都放在了法权和政治哲学研究上。康德所处的18世纪是欧战频繁的一个世纪，1701年到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年到1721年的北方战争，以及1756年到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影响几乎席卷全部欧洲国家。国家冲突频繁的现实使得康德意识到人类历史的常态并非和平而是战争。因此，进

行一种人类文明从战争向和平的改善和进步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考，指出人类发展朝向永久和平的和目的性的目标，上述观点便成为晚年康德思想的最终落脚点。

在康德看来，一个建立在私权之上的市民社会需要有一种公权来加以维系和保障，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国际法等内容，公共权利不仅表现为不同的政治体制，而且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民族权利，并由此构成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法则。在 1795 年完成的《论永久和平》中，康德提出建立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宪政共和国的理想，认为个人只有成为国际社会公民体系中的成员，国与国之间才可以克服战争状态进入永久和平，一种真正的文明——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得以摆脱野蛮，进入自由正义的理想状态——才能得以实现。尽管通往永久和平并非易事，但康德认为，大自然的机制是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最终解决的，因为大自然就是通过彼此在外部自然而然的、相互对抗着的自私倾向，使得那些心存不和的民族自身必须相互都屈服于强制性的法律之下，从而促进内部以及外部的和平。简单地说，就是“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最终达到一个“伟大的各民族联盟”。康德的世界政府的理想并不是原创，在他之前有法国的卢梭和圣·皮埃尔，但无疑康德的论证更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逻辑性，并且在 20 世纪得到了初步的实现。1945 年，《论永久和平》中的许多原则被写入《联合国宪章》。

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再到欧盟的成立，欧盟宪法的颁布，人们正在朝着两百多年前那个智慧的老人所描绘的理想状态努力——逐步完善国际法；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在面临一些全球性事务如饥饿、疾病、自然灾害和贫困时加强合作等等，而哲学家康德，正是我们最深刻的启发者。

托马斯·潘恩

托马斯·潘恩（1737～1809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生于英国基督教教会信徒的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后来离开英国，投入北美独立革命运动。主张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美国独立后，又去法国参加了大革命，并取得了法国公民资格。1802年后回到美国，但是他的政见与美国联邦党人不符，受到联邦党人和反动教会的打击与迫害。潘恩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早将社会和国家区分开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社会是由人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人们的邪恶产生的；社会的目的在于维护大众的幸福，而政府是为了制止人们的罪行。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有《常识》、《人权论》、《理性时代》等。

《人权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柏克攻击法国革命的回答。在这一部分里，作者谈了自己的人权观以及由此得出的国家观。首先，潘恩指出在任何国家里，从来不可能有一个议会或者任何一类人拥有权利或者以权力来永远约束子孙后代。他认为死后统治的设想是一切暴政中最荒谬而又蛮横的，因为政府是为活着的人服务的，而不是为死人服务的。以前的法律之所以还在实行，那是因为它得到了当代人的认同。在法国，到处都有专制主义的标记。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由私人的仇恨所激发的，但是在法国，却是来源于人民对人权的合理考虑，而且他们的目标决不因一个仇敌垮台就能达到。

潘恩认为，所有的人都生来就是平等的，并有平等的天赋权利。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宣扬这个观点。人的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就是人的天赋权利。天赋权利是人在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公民权利则是人作为社会一员所具有的权利。由此可以得出三个

结论：公民权利来自于天赋权利；这种天赋权利在个人身上是不充分的，但是如果汇集到一点，就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由天赋权利集合而成的权力不能侵犯由个人保留的那些天赋权利。宪法不是因一种理想而存在，而是现实的需要。最后，作者对英国和法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做了一番比较。英国和法国的行政权都在“国王”的手中，但是法国宪法把国王和主权区分开了，而且总是把国民放在国王前面，把立法放在行政前面，把法律放在国王前面。代议制政府和世袭继承制政府分别是建立在理性和愚昧这两种基础之上的。主权作为一种权利只能属于国民，而不属于任何个人，国民任何时候都有权废除一种他们认为不好的政府。从人类进步的角度可以看出，世袭的政府正走向衰亡，而代议制政府则是时代潮流的产物。

在第二部分的导言中，潘恩强调美国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伴随着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不仅仅是脱离英国。人类社会中的支配地位的秩序，都是社会的原则和人类的天性所造成的结果。政府的作用最多在于解决社会和文明所不便解决的少数的事情，正式的政府不过是人类文明生活的一小部分。现存的旧政府是开始于罪恶和耻辱的，对于这样的政府，最迅速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新开始。旧体制的政府夺取权力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新体制的政府则不一样，它代表社会共同利益而行使权力。代议制政府以社会和文明为基础，世袭制政府则排斥人类的智慧。如果不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那么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是好政府。宪法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一种对政府加以控制的法律。政府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在美国和法国，宪法总是排在政府的前面，并且总是和政府相区别的。政府的惟一目的是谋求普遍的幸福，如果政府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一定要改革政府所依托的那种制度。革命产生于两个原因，一是要逃避灾难，二是要获取利益。前一种革命因情绪慷慨激昂往往容易付诸东流，后一种则较容易成功。不管是哪一种，一旦获得成功，就会影响其他国家，甚至把专制主义和腐败政府彻底地铲除。

《人权论》是潘恩除《常识》外的又一部政治学名著，该书

出版的直接目的是批驳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一书。对于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与责难，潘恩在书中一一予以回击。除此之外，作者在书中还宣扬了美国独立革命的意义。在该书中，潘恩提出了许多后来广为人知的理论与观点，如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政府的作用与限制，权利的分化与制衡等，这些现在都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基本原则。该书与《常识》一起直接影响了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该书在政治思想史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了解西方政治体制与原则发展的一个窗口。

杰瑞米·边沁

杰瑞米·边沁（1748～1832年），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出身于一个律师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成年后担任伦敦大学教授，并被法国革命政府选为法国荣誉公民。他鼓吹功利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提倡改革政治和法律制度，信仰绝对平均主义的民主原则。他判定，只有使政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建立大多数人的统治，才能保证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著作主要有《道德与立法原理》等。

在《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中，作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人类行为的本质、防范犯罪的方式及建立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与原理。

边沁认为，正像自然界一样，人类也有自己的规律，就是善于“趋乐避苦”。“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这种本能支配着人类的一切行为。因此，我们判断一个行为的好坏决定于这种行为是否具有增加快乐减少痛苦的作用。边沁指出，“乐”就是指“功利”，功利意味着对任何人来说，任何事物都可能产生福利与幸福而防止发生灾祸与不幸。他把苦与乐分为“单纯”和“复杂”两类。“单纯”的乐是指由器官感觉、财富、技能、美名、权力产生的快乐等；“单纯”的苦是指贫穷、感觉、仇恨或者恶名产生的痛苦等。“复杂”的苦由多种“单纯”的苦汇集而成，“复杂”的乐也由多种“单纯”的乐聚集而成。不管所有的苦与乐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边沁的“避苦求乐”原则分别对快乐和痛苦做出了十分详尽的分类，并提出了快乐和痛苦的计算方法。该原则主要是用于指导立法的，实际上也被当作一个解决法的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

在《道德与立法原理》中，边沁还论述了刑法问题。他认

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使用奖惩办法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政府可以根据危害幸福的行为及其犯罪的程度对制造危害行为的人做出惩罚。边沁认为，如果一种行为造成了伤害，那么它的动机也就是伤害性的。并因此而产生了派生的伤害，它涉及整个社会或其他一批不可确定的个人。派生伤害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痛苦，另一部分是危险。一件过去的犯罪行为，既可能包含着削弱防止这种罪行发生的政治法令的效力，也有可能削弱防止这种行为的道德性法律的力量，因此，必须对犯罪者予以严格的惩罚。根据功利原理，如果惩罚被认为确有必要，那是因为它可以起到保证排除更大罪恶的作用。

《道德与立法原理》是边沁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代表作，也是其功利主义思想的一个着重体现。由于深感当时英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缺少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边沁沿着自己的功利主义思路写成了《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将功利主义思想融入政治和法律制度。在书中，作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探讨了人类行为的本质、防范犯罪的方式及建立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与原理，并阐述了立法、道德以及政治之间的关系。该书的出版使功利主义成为西方各国立法与行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对西方政治学和立法原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该书仍然是西方政治学界和法学界广泛参阅的重点书目，一些理论还有着大批的信徒。

丹 东

丹东，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活动家。

丹东出生于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检察官。他从小就喜欢法律，想干一番大事业。丹东14岁离家到省城读中学，在此广泛阅读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的著作，接受了大量的革命思想教育。同时，他也刻苦学习拉丁语、意大利语，阅读一些外文书刊。在巴黎的高等学校，丹东专攻法律。1781年，他获得了律师资格，受雇于一位检察官。1785年起，丹东在巴黎的高等法院任律师，他的能言善辩给接触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预感到法国当时的社会像冰山正在崩塌下来，小规模的改革方案根本无法挽救这一颓势。两年后，当震撼欧洲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丹东立即投入了滔滔的革命洪流当中。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后，丹东应征参加资产阶级卫队，他活动积极，深受群众拥戴。10月，他被选为哥德利埃区区长。不久加入雅各宾俱乐部，热心群众斗争。不过，丹东仍主张保持国王的地位不变。1790年初，他组织了哥德利埃俱乐部并成为主席。在俱乐部里，丹东、马拉等人对君主派的反人民本质进行猛烈的抨击，宣传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不久，丹东宣布放弃自己在皇家枢密院律师的头衔和津贴，此举表明了他与封建王权决裂的决心。11月，他因演说揭露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弊端受到迫害，到伦敦避居。在这里，丹东考察英国政治，接触激进派名流，思想受到很大触动。回到法国后，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斗争。1791年6月，路易十六乔装外逃被人民押回巴黎。丹东领导的哥德利埃俱乐部向政府提交请愿书，宣布“王权与自由不能并存”，恳请立刻宣布推翻君主，成立共和国，但是支持的民

众受到了当权的大资产阶级镇压。丹东等领导人迫于形势藏匿起来。同年8月，普、奥反动派组织联军干涉法国革命，国内王党趁机活动，革命受到内外威胁。11月，丹东就职巴黎市府代理检察长，用演说表明了他为民族尊严、为自由为平等和宪法战斗到死的决心。第二年。法国对奥宣战，丹东与群众奋力抗敌，不久他即成为革命重要领导人之一。7月初，奥普联军侵入法国境内，形势危急，丹东挺身而出。7月30日，他所在的地区通过决议，宣布所有公民不论消极或积极，享有同等权利，同时宣布废黜国王。巴黎市组织成立起义委员会，旨在推翻大资产阶级统治，丹东又成为委员会主要领导人。8月9日夜，他以极大的感召力奔走各区兵营，组织和指挥起义。第二天，成千上万的武装群众终于冲进王宫，推翻了君主立宪的大资产阶级统治。

起义胜利后，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掌权。丹东作为惟一的雅各宾派首领参加临时政府，任司法部长。不久，普鲁士军攻破法国边境，直捣巴黎外的凡尔赛城。丹东坚决反对迁都，他说：“巴黎是法国的化身，你们放弃巴黎，就是认输投降。就是举法国而降敌。”他主张用恐怖手段猛击国内敌人，发动群众打退入侵者。9月2日，当凡城失陷的消息传来，丹东在立法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大家将要听到的警钟，不是恐惧的信号，而是向祖国的敌人发起冲锋的号角。要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演说激起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法国人民英勇奋起，狠狠打击了保王势力，并取得了第一次反击侵略军的胜利——瓦尔米大捷。

国王的罪行逐步暴露，群众强烈要求审判国王，丹东终于放弃了保佑国王的希望，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793年1月22日，路易十六被处决后，国内外烽烟再起，而当权的吉伦特派置之不理，却致力于打击革命民主派。丹东怒不可遏，建立了救国委员会，在打击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并在外交上取得一系列成功。6月，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等人为挽救共和国，组织武装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政权，建立雅各宾专政。随着雅各宾专制政权的延伸，丹东开始反对恐怖统治，提出“要爱惜人

类的血”，并希望罗伯斯庇尔“摆脱诡计，与爱国者团结一致”。这使他遭到了救国委员会的逮捕。1794年4月5日，丹东以叛国通敌、危害共和国的罪名被判死刑，这年他35岁。

由于丹东身上带有一些贪财爱色、讲究享乐、生活腐化的劣习，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确曾为拯救法兰西共和国的安全和独立舍生忘死，这是不可忽视的。

圣西门

昂利·克劳德·圣西门（1760～1825年），19世纪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思想家。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著名的贵族家庭，曾经得到一些著名的教师指导。根据当时法国贵族的传统习惯，他在16岁时入伍服役，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圣西门随军参加了这次战争。战争结束回到法国，由于对军队生活的厌倦，他放弃了军职而到欧洲各地游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时，圣西门回到了法国。他一度接近革命，拥护民主自由思想，放弃了自己的贵族爵位。当他察觉到了旧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同时对革命暴力又抱有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在离开革命斗争之后，1791—1797年期间与人合作从事金融投机活动，不久便成了百万富翁。靠投机得来的巨富，圣西门转向学术研究活动，广结学友，跟他们研究学问。但是终因挥霍的生活，很快耗尽了自己的财产，而至一贫如洗的境地，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圣西门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著述活动的。他历经艰难，顽强写作，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形成一个学派奠定了基础。1825年逝世。

圣西门的主要著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人类科学概论》（1813）、《论财产和法制》（1818）、《寓言》（1819）、《论实业制度》（1821）、《实业家问答》（1823—1824）和《新基督教》（1825）等。

圣西门以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观为基础阐述其学说。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具有规律性的，它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种社会发展存在着规律性的思想贯穿在圣西门的全部著作中，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核心。按照他的说法，人类历史犹如自然界一样存在着规律性。人类只有对过去和现在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发

现它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才可以预见未来。并且社会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人类理性思维在不断地发展，即哲学以及理智、科学、道德和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从一种体系演变为另一种新的体系，从而导致现实的社会也相应地从一种社会制度转向另一种社会制度。他由此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当然这些阶段都是与人的理性思维发展相适应的，并认为“实业制度”就是理性思维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封建社会和实业制度的过渡时期，并对它作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揭露以国王为首的富人集团剥削着广大的劳动者集团，抨击整个社会充满着冲突和罪恶。他还初步意识到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始终无法认识到私有制度才是他所抨击的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现象的真正根源。

圣西门在描绘他的理想社会即“实业制度”时表现出天才的远见。他认为实业家（包括工人、农民和各类资本家）创造着一切的社会财富，又具有管理生产的能力，是该制度的领导力量，实业制度中的领导机构应由实业家（实际上是资本家）和科学家掌握。它将从现在只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国家机构转变成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的组织。而且，未来社会制度的职能是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进行生产，实行计划经济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还十分重视未来社会的联合和协作，强调统一的有计划指导，这样可以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有效地把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等一切工作结合并协调起来，以促进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从而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实业制度是从事有益工作的人联合起来的社会，因此在这个社会人人都要劳动，不承认任何特权。这样人们的收入是根据人们的贡献进行分配的。

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当时曾经起过积极和进步的作用。如对国家职能、普通劳动、计划生产等，他都有卓越的远大的目光，以至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所有的、但并非十分严格的阶级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但是，圣西门学说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的实业制度存在着一个根本性

缺陷，即它并没有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反而主张有必要保持私有制及其剥削收入。尽管他同情无产阶级，晚年还自称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但是他却极力反对广大劳动群众参加阶级斗争。同时他也看不到实行新制度的伟大力量，而把实现新制度的希望寄托在国王和资产阶级的身上，并幻想说服他们去实施社会改革。这样他的实业制度必然只能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在怎样实现“实业制度”的问题上，就突出地表现出他的学说的空想性质。他坚信依靠天才人物去发现符合理性思维的科学体系，并且通过宣传、大造舆论就能被权势阶层特别是国王所接受，就能立即实行实业制度。同时他反对一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认为利用和平手段就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后来他的门徒以他的学说为基础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并把他的学说进行神秘化而最终解体，从而走向了与圣西门本人意愿相反的方面。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年出生于符腾斯图加特城一个税务员家庭。他小时一直规规矩矩地上学、读书。惟一与众不同的是，他聪明、好学，遇见什么不解的事都非要弄明白不可。他有特别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黑格尔7岁时上小学，10岁时上中学，18岁时进入了图宾根神学院学习哲学与神学。在这里，黑格尔的才能便充分显示出来了，他有极强的思辨能力。在神学院中，他除了学好必修的功课之外，对古代及近现代著名的哲学人物与作品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时，黑格尔形成了他自己关于世界观的体系，虽不完善，但足以证明他所遇到的事物。1793年，黑格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开始时，他先后在瑞士伯尔尼与法兰克福做过家庭教师。1801年，经当时著名哲学家谢林介绍在耶拿大学任编外讲师，由于他的学术水平高深，不久便升为副教授。这时，黑格尔仅仅35岁。身怀绝世之才的黑格尔不想平淡地呆下去，他有许多思想要向世人告白。于是不久，他开始写《精神现象学》。1806年10月13日，黑格尔匆匆脱稿，以便出版商及时出版。在书中，黑格尔高度地赞扬了拿破仑，称之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灵魂”，他说：“我看到皇帝——这个世界灵魂，骑马穿城而过，去检阅军队。”

1807年，黑格尔因为学校战时停课，一时无所事事。不久，他担任了海德堡物理学会名誉会员，后得到同乡尼特哈默尔介绍，前往巴伐利亚的班堡担任《班堡日报》的编辑。不久，精力充沛的黑格尔的《科学体系：第一部，精神现象学》在班堡与维尔茨堡出版。他把书寄送给谢林征求意见，但是谢林反应冷淡，他甚至说黑格尔剽窃了他的观点而又叙述不当。两人于是闹翻而决裂。

1808年，黑格尔转任纽伦堡文科中学校长，全才的黑格尔兼教哲学、古典文学及高等数学科目。这时，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日渐完善，并在学术界引起重视。他的一个学生把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上的贡献称之为当代的“亚里士多德”，而把谢林称为柏拉图，其意不言自明，柏拉图是开路者，而后者贡献更大。

黑格尔特才傲物，因此与同事们关系不是太好，但是他依然凭借自己的学术成果而当选为年度校长。可是却遭到评委的反对，黑格尔愤而辞职。这一年，弗里斯的《逻辑学体系》出版，黑格尔依然我行我素，他直言不讳地说：“《逻辑学体系》是毫无意义的出版物。”其后不久，黑格尔自己的《大逻辑》出版。在这里，黑格尔第一次应用到了辩证法思想。一年之后，《逻辑学》第二册《本质论》出版，这是他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恩格斯说：“他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这几本著作，奠定了黑格尔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1816年7月，黑格尔先后接到海德堡、爱尔兰根、柏林三所大学的聘请书。

1916年秋季，黑格尔来到巴登公国的海德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接替了弗里斯的职位。10月28日，黑格尔发表就职演讲，公开宣称“普鲁士国家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反他青年时的论调。那时，他崇拜卢梭，崇拜拿破仑，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热烈地向往革命。并且，他与他的同学们一起在图宾根近郊种植了一棵“自由之树”。这前后不同的态度，表明了黑格尔的思想日渐保守。但他的学术水平却无可挑剔。第一年，他的学生有四个，第二年便一下增为十个。这一年，他的《逻辑学》第二卷主观逻辑、概念论出版，列宁称赞这部书说：“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这是事实。”

1817年，黑格尔受到普鲁士文化教育卫生大臣阿尔滕斯坦的邀请，去接任费希特逝世后悬虚的哲学教席遗缺。1818年10月，黑格尔到柏林大学就任哲学教授，年薪比他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时

多一倍，虽然他想从政的愿望再一次落空，但依然满意地呆了下来。1819年，叔本华也来到柏林大学任编外哲学讲师，他把开课时间定在黑格尔讲课的时间，结果，叔本华的听讲者人数寥寥，课程未授完，叔本华便悄悄离开了学校。

黑格尔对于文学艺术非常喜爱，他每到一处，必先打听是否有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在此地。在柏林也是如此，他经常参加一些文学艺术集会。有一次，黑格尔听一场莫扎特乐典演奏会，一曲完了之后，黑格尔向该队指挥克莱因兴奋地表达自己的欢愉之情，但由于他不善言辞，越着急越说不清，口吃得越厉害，克莱因最后总算明白了黑格尔赞美的意思。他后来说：“这一来，我算真喜欢这位口吃的哲学家了。”

1821年，黑格尔出版了《法哲学原理》。在书中，黑格尔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最完善的政体，这表明，黑格尔又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方面去了。阿尔腾斯坦大臣复函黑格尔，称他为“普鲁士复兴的国家哲学家”。

由于黑格尔的哲学适应了普鲁士国家的需要，他在柏林大学的讲座吸引了不少听众，黑格尔主义一时颇为流行。他的学生为他与歌德举办联合生日庆祝会，使黑格尔的影响更为广泛。1826年，叔本华再次来到柏林大学讲课，时间仍与黑格尔讲课时间相同，因无人听讲，他又悄然收场，黯然离去。但是，这时唯物主义哲学开始成长起来。黑格尔的学生费尔巴哈与他告别时说：“我听了您两年课，我两年来完全献身于研究您的哲学。但是，现在我感到需要求教于与思辨哲学直接相对立的其他科学，即自然科学。”后来，费尔巴哈成为了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1828年，这时黑格尔58岁。第一学期，他讲授自然哲学时，听课学生68人；与此同时，里特尔讲授古代哲学史，讲课时间正与黑格尔相同，他的学生84个。这表明黑格尔哲学已出现衰落的迹象，但是，他在某些课程中，依然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例如，在他讲的关于证明上帝存在的说明时，听课学生约有百人，并一度达到200人。1829年10月，黑格尔接受普鲁士国王的任命，担任柏林大学校长职务一年，成为钦命青年导师。

1831年，由于黑格尔表现出来的对于政府的顺从与拥护，普鲁士王威廉三世授予他三级红鹰勋章。这一时期，黑格尔主要是讲授法哲学，还修订了《精神现象学》以及为《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再版写序言。

1831年11月14日，黑格尔感染了霍乱病，在柏林逝世。按照他的遗嘱葬在费希特与佐尔格墓旁。

黑格尔逝世后，黑格尔哲学依然风行了10年之久，“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感染了与之相对立的思想势力。这一时期，黑格尔的观点浸入了大量的各种科学之中，甚至渗透到通俗读物与日报之中。当时所谓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与日报中汲取这种思想材料的。他的著作除了生前出版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其中包括《小逻辑》、《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等，逝世后又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了《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美学讲演录》等。他在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的遗缺也由他的一位学生接任。但是，并没有人完全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也成为他屡遭误解的原因。著名的革命文学家海涅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他听黑格尔讲课期间，有一次，海涅对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表示疑惑不解，黑格尔怪怪地笑了笑，对海涅说：“也可以这么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黑格尔说完连忙转过身向四周瞅了瞅，只有亨利希·贝尔注意到这句话，他这才放了心。随后，黑格尔对海涅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指他的学生罗森克兰茨），但随后又激愤地加了一句：“甚至他也不了解我。”

伟大的黑格尔逝去了，他的伟大的著作以历史主义与辩证法为基础构建了哲学发展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包罗万象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也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别人对他的哲学的不完整的理解甚至是误解之上的。不知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

罗伯特·欧文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19世纪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一个小手工业家庭。由于家庭贫困只读过4年书，年仅10岁的欧文便外出谋生，曾当过商店的学徒和雇员等。在辛苦的劳动之余刻苦自学。并对社会有广泛的了解，目睹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1789年欧文与他人合伙开办了一家生产纺棉机的小厂，成为小业主。1791年起先后被聘为大纺织厂和著名公司的经理，在他的经营管理下，工厂在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从而使他在全英棉纺业界赢得了声誉。不久他就辞去经理职务与另一家纱厂合作，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很快把这家厂办成拥有几个分厂的联合公司，欧文成为拥有相当股份的股东。1800年欧文担任新拉纳克纺织厂的经理，以慈善为目的进行改革，因成绩卓著而声誉日增。1820年前后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这个时期，他从一个慈善家转变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1824年他和他的信徒们到美国进行“新协和公社”试验。四年后此举失败，他又投入到英国工人运动中，并继续宣传和推行他的各种试验方案。1833年他领导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实质上是英国第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1834年该组织被迫解散后，他又继续推行小型试验，如建立“和谐大厦”和“皇后林新村”都没有成功。

欧文的代表作品是：《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1816）、《致拉纳克郡的报告》（1820）、《论全新的社会状态的演讲》（1830）、《新道德世界书》（1842～1844）、《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等。

欧文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他明确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的根源，是阻挡资本主义制度改造的三大障碍中

的祸首。因此他主张要取得人类的幸福，必须实行公有制。他完全接受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论，并能够较正确地运用这一理论。他认为既然财富是劳动创造的，那就应该由劳动者共同享有，而事实上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剥削了工人。劳动者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他进一步指出，大机器的使用加剧了劳动阶级的贫困和痛苦。一方面大机器的使用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财富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结果世界上充满了财富，然而这财富却不能被创造者——工人所拥有，整个世界到处笼罩着贫困。在这里他已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中两大阶级的对立。就这种对立而言，他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过时，迫切要求进行人类事业的巨大变革。他还把经济危机的产生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但是他未能由此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把解决这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了剥削阶级身上。

欧文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合作公社”，它实行财产公有制，公社全体成员集体进行生产劳动和消费。在公社里，劳动是自愿的愉快的事情，每个成员都应该被分配给适当的工作，同时需要从事多种工农业劳动，既各尽所能，又能够得到全面发展。由于产品十分丰富，分配则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他还十分重视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来促进劳动者的脑力与体力相结合，使得每个人都能全面发展。他又主张公社应当把城市和农村的优点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包含了消灭工农差别、城市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的萌芽。显然，欧文的这些设想具有对共产主义的天才猜测。欧文设想的公社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但是他比傅立叶前进了一步，他认为公社之间存在着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交换，这种交换遵循着等量交换的原则。不过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把无产阶级当作实现新制度的依靠力量。总的来说，欧文的“合作公社”的思想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欧文对货币持否定态度，认为它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它不仅使资本家有可能剥削工人，而且也限制了财富的生产。

他主张既然劳动创造价值，就应该直接以劳动为价值尺度，而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价值尺度。为此他曾经建立过劳动公平交换市场，实行劳动券制度，即劳动者将自己的产品交给市场，同时获得相应的劳动券，然后凭券向市场领取等价的其他劳动产品。欧文企图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弊端，这说明他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的本质。同时他也不了解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以及商品经济的进步作用。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产品经济，只能是空想。同样，这种试图在维护私有制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有组织的交换，也同样是一种空想，所以他的交换市场最后不得不宣告破产。

欧文是个杰出的社会实践家。他的思想学说的形成始终同他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他先后进行过以慈善为目的的“新拉纳克”管理、公平交换市场和空想共产主义即“新协和公社”的试验，又是全国性工会组织形式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还创办过幼儿园、工人学校和公共食堂。他一生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积极推行其改造社会的试验方案，这些活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很好的推动作用。总之，英国当时一切有利于工人的社会运动和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约翰·赫尔巴特

约翰·弗里德里奇·赫尔巴特（1776~1841年），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出身于德国奥尔登堡。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并在多方面表现出过人的天赋。中学毕业后遵从父命考入耶拿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却在这所哲学氛围浓厚的大学里为自己将来从事的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大学毕业后，赫尔巴特为一位贵族担任了三年家庭教师，其间积累了大量的教育经验，结识并受到裴斯泰洛奇的影响。随后到哥廷根大学攻读并获得哲学博士，毕业后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哥尼斯堡大学任教。他的教育学著作有：《普通教育学》、《裴斯泰洛奇直观教育法ABC》、《教育学讲授纲要》、《实践哲学概论》等。

《普通教育学》全书共分为三编14章，其中1~2章为第一编，题为“教育的一般目的”；第二编题为“兴趣的多方面性”，包括六章内容；第三编题为“性格的道德力量”，包括最后六章内容。

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理论体系有两个理论基础，即伦理学和心理学。道德是人类的最高目标，也是教育的最高目标，教育的目的应该依据伦理学。就教育学的伦理学基础来讲，有以下五种道德观念：内心自由的观念、完善的观念、仁慈的观念、正义的观念、公平的观念。在以上五种道德中，前两种针对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言，后三种则是针对个人与他人发生社会关系而言，这五条伦理观念包含着道德的一切类型，是巩固世界秩序的永恒真理。教育的具体方法的确定必须依据心理学，教育的第一门科学就是心理学，心理学是教育学的基础。作者在这里提出一种“统觉”的理论，以此来阐述新观念形成的过程。

本书所阐述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儿童的管理。赫尔巴特指出，进行教学之前必须对学生进行管理，管理不善将导致儿童反社会倾向的发展。这种管理并非要在儿童心灵中达到任何目的，而仅仅是要创造一种秩序。

本书关注的第三个问题是教学理论问题。作者提出了教育性教学的概念，指出应该把实现教育目的与传授文化知识看做同一过程，把学校的全部工作都归结为“教育性教学”。教学论的前提和基础是多方面兴趣的理论，教育除了培养道德这一最高目的外，还有发展多方面兴趣的目的。兴趣来源于使人感兴趣的事物与活动，包括认识的兴趣和同情的兴趣。教育应该对应于兴趣的分类，拟订相应的科目，以便于学生学习。教学的过程包括“专心”和“审思”两个基本环节，也可以将教学的过程划分为“明了”、“联合”、“系统”、“方法”四个阶段，同时学生的心理状态可以分为“注意、期待、探究、行动”四种。从教学类型角度出发，可以把教学分为单纯提示的教学、分析教学和综合教学三种。这三种教学方法之间是一种递进和交叉的关系，三者必须统一运用，不能截然分开。

最后一部分作者探讨了德育教育的问题。他认为德育教育就是品格教育，目标是向学生灌输“内心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和“公平”等道德观念。德育教育绝不要发展某种外在的行为模式，而要在学生心灵中培养起正当的行为方式与适宜的意愿。道德和性格是联系在一起的，道德是人内在性格的力量，个人意志力量的表现。道德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两方面，教师的主要注意力应放在道德性格的客观部分上，也就是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上。所谓“训育”是对青少年的心灵产生直接影响，有目的地进行教育的方式。它是德育教育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学生性格的形成与所受的训育是成正比例的，它对性格培养的关系是双重的。训育应该与儿童的管理和知识相结合，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陶冶和教师人格的间接影响。

《普通教育学》一书是赫尔巴特早期的作品，也是奠定他在

教育学上地位的重要著作，他晚年的另一部作品《教育学讲授纲要》则是对此书的整理与补充。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许多对现代教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观点，如发展人的兴趣、促进能力的和谐发展等。该书对教育学的重大贡献有两点：一是将心理学引入教育学，确立了教学论；二是将伦理学引入教育学，确立了教学目的论。该书的内容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教师中心”理论，强调纪律对于性格培养的作用。

赫尔巴特被认为是近代教育学家中试图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开山鼻祖，他以心理学和伦理学作为建立系统教育理论的基础，该书无疑正是这种努力与尝试的最好见证，因此被视为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值得回味的是，以《普通教育学》为代表的赫尔巴特的思想在他死后几十年内仍未被重视，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他的思想才在西欧和美国盛行起来。

阿图尔·叔本华

阿图尔·叔本华，1788年2月生于但泽（即今天波兰的格但斯克，那时是德国领土）。父亲是一个大商人，母亲是一个颇有才气的女作家。由于父母的性格不合，所以时常借着娱乐活动来减少相互间的摩擦，旅行就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就这样，叔本华从小不得时常随着父母四处出游。据说他的父亲相貌长得令人不敢恭维，且脾气也很暴躁，而他的母亲则聪明美丽，且富文学才华，外国语也说得流利。叔本华自己也曾说过：“我的性格遗传自父亲，而我的智慧则遗传自母亲。”这大概正是他自己特色的写照，如果确定是这样的话，那么，叔本华在先天就已经播下了“怪癖”和“天才”的种子了。

叔本华8岁那年，随父母游历，途经法国，在巴黎近郊滞留了一段时间，其父为了儿子能彻底学会法文，便把他托付给一位商业上的朋友，自己则携妻返回到汉堡。叔本华在此处生活、学习了差不多两年。据他自己称，这是他一生中最最愉快、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欢乐时光。之后，他回到了汉堡的父母身边，并在父亲的刻意安排下，进入到一所商业学校读书，以便将来能继承父业。由于叔本华的父亲是商界名流，母亲又与文艺界人士素有往来，所以他家中常有名人雅士来往。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环境，使得叔本华开始嫌恶商业生活的庸俗和那种世俗味道，心里从此便埋下了做学问的种子，就连学校里的老师，也从这位小小年纪的人的身上发现出他的哲学天才来。但是，叔本华的父亲坚持不让其独子弃商从文。直到1804年秋，他的父亲去世后，叔本华才脱离开囚役般的从商生活，真正踏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归纳、总结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可以由下面几句话来描述：人生是意欲（或称之为意志）的表现，意志又是无法满足的渊

藪；而人生却又总是去追求这种无法满足的渊藪。所以，人生即是一大痛苦。叔本华，这样一位一生不为吃、喝担忧，不为奔走挂虑，不为仕途操心的哲学家，却把人生描绘得如此灰暗，把幸福看得如此一钱不值，着实让人感到惊奇。那么，他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呢？

叔本华的哲学以及一切细节，都在他的那本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有了充分的说明。尽管此书的出版时间是在1818年尾，但是，这本书的基本概念却早在差不多4年前就已经在叔本华的脑海中形成了。1816年，叔本华正值28岁。可是，纵观他后来写的一切东西，我们不难看出，都是在证实或解释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的哲学思想，在那些著作中，这种哲学思想始终没有变动，既没有增加点什么，也没有减少点什么。到了70岁的时候，他心里仍然让28岁时的观念全部给占据着，虽然他在这数十年中，仍然不断地获得新的更多的知识，但都丝毫没有改变过他内心的一切。他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这就是：唯我主义的唯心论、唯意志论的哲学体系、反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

叔本华除了本行哲学之外，还兼习医学、物理学、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理学、法律学、数学、历史、音乐等诸多学术领域，而且行行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且行行他都能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去对待，都能显出他独特的个性来。他的音乐才能还受到了大音乐家瓦格纳的赞赏。正如叔本华本人所说：“人类的问题不能单独研究，一定要和世界的关系连带着研究，……要把小宇宙与大宇宙联系起来看待。”

叔本华的哲学命运开始并不顺利，他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于1818年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他所预想的轰动，一年半的时间内只卖出去了140本书，其余的都报废了。这使得他心灰意冷，非常伤心，于是他变本加厉地攻击他的哲学对手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说他们是哲学骗子。之后，他还去了柏林大学，不拿薪俸地讲授他的哲学体系，可惜听课的人太少。与此相同，各大学都不理会其人其书，似乎要证实他的断言：哲学上

的一切进步，都是在学院门墙之外取得的。尼采也说：“最使德国学者恼火的，莫过于叔本华与他们迥然不同。”

1831年8月的一场霍乱迫使叔本华逃离了柏林，跑到了法兰克福。这一沉寂便是20个春秋，直到1851年。人们在读到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附录和补充》时，才恍然大悟，认为叔本华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他的哲学整整沉寂了30多年。终于，他像一个从一场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凯旋归来的英雄，顿时名噪全欧、誉满天下。各国人士络绎不绝地去拜访他；全国的报章杂志不断地登载他的名字；他的信徒们三番五次地为他画像、雕像，之后当神一般的供奉在屋中，顶礼膜拜。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这其中竟然还有两位太太曾去造访过他。叔本华的哲学为什么会有这样深远的影响，如此的魅力呢？这首先应归功于他独树一帜的“意志哲学”，其次，他那超群的语言才华也功不可没。叔本华这位素来被称为极忧伤、极悲观的哲学家，最后大概是“乐极”地躺在沙发上溘然辞世。

近代，有许多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尼采、瓦格纳、托玛斯·曼等人，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其中尤以尼采所受的影响最为突出。叔本华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前后兴起的唯意志论哲学流派的先驱和主要代表，他的理论不仅奠定了唯意志论的基石，同时对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甚至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都有一定的影响，无疑也是西方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方面。

托马斯·杰斐逊

“这里埋葬着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暨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及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1801～1809年在职）生前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墓志铭上没有写上他的总统职务。在他看来，总统这个职位并不比他以上列举的三个头衔更重要，他说，除了上述这些字，不要外加一个字，“因为依据这些字，作为我一生的论定，我希望最能受到怀念”。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出身于弗吉尼亚的古克兰特县的一个大种植园家庭，祖先大约是17世纪80年代从英国北威尔士移民纽约的。父亲在弗吉尼亚担任县级公职，也是个拥有大约7000英亩土地的种植园主，拥有100多名奴隶。杰斐逊的优裕家庭环境，为他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在他童年时，已开始学习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并且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古典教育。17岁时，杰斐逊进入弗吉尼亚首府威廉斯堡的威廉一玛丽学院，这所学院有许多当时北美学术界权威（大部分都是来自英国），比如自然科学家威廉·斯摩尔，他是杰斐逊自然科学和修辞学方面的引路人和指导者。另外一位教授乔治·威恩，是弗吉尼亚的权威法律学家，杰斐逊从他那里受到了严格和精深的法学教育。这两位教授对杰斐逊成为学识渊博的律师和政治家有重要影响。

杰斐逊绝不是一个书呆子。他涉猎广泛，兴趣多样，对建筑情有独钟，水平不下于专业建筑设计师，他引为骄傲的蒙蒂塞洛庄园就是他亲自设计的，既有古典建筑风格，又融合进了他自己的想像力。他还是一位植物学家，不论是在管理父亲留下来的种植园时，或是在外出旅行时，他都留意观察和调查植物的生长及

特性。在从 1766—1824 年间，他的“园艺笔记”和“农田笔记”是他坚持了数十年的观察记录。

面对着日益紧张的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律师，与普通群众和现实生活有紧密联系，虽然在政治上他还没有展露才华，但是他的家乡阿尔贝马尔县的居民把他选进了弗吉尼亚议会。这个议会与英国总督针锋相对，争取殖民地议会和人民的权利。议会中最活跃的 4 名议员是：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李，还有一个就是杰斐逊。以他们 4 人为核心，发起了抵制英货运动并草拟了相应的文件，规定从 1769 年 9 月 1 日起殖民地人民不再购买英货。这是杰斐逊投身反英斗争的第一个行动。为了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英斗争，1774 年杰斐逊写出了《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言词犀利，矛头直指英王，由于多数议员认为过于激烈，弗吉尼亚议会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另一份措辞比较温和的抗议书。在这以后，杰斐逊一直致力于武装抗英的宣传，以“独立”的思想来唤起各殖民地与英国脱离的决心。直到 1776 年 7 月 2 日，大陆会议终于指定杰斐逊等 5 人负责起草独立宣言，并决定由杰斐逊执笔。7 月 4 日杰斐逊拿出了宣言的稿本，宣言中明确宣告美利坚合众国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享有独立国家的一切行动的全部权力。宣言中宣布的“人人生而平等”，“政府的正当权力，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政府损害人民的权利时，“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这些民主、自由原则，赋予了《独立宣言》以世界性普遍意义，也为执笔人杰斐逊树立了不朽名声。

杰斐逊引以自豪的第二件事是为制定“宗教自由法”所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斗争。在北美 13 个殖民地里，官方教会（分别是圣公会和公理会）统治着 9 个殖民地，对其他教派进行歧视、迫害。杰斐逊认为信仰自由的原则是人们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但是在最有影响力的弗吉尼亚议会中主张信仰自由的是少数。从 1776 年开始，杰斐逊在议会内外坚持斗争，他在 1779 年提出的“宗教自由法案”直到 1786 年才得到议会的通过。

杰斐逊在共和国诞生后除了在弗吉尼亚议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外，还担任过弗吉尼亚州长、驻欧外交代表和驻法公使等职。在他担任驻法公使期间（1785～1789年），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过程。杰斐逊作为美国《独立宣言》的执笔人深受法国人民和政界的尊敬，杰斐逊对法国也怀有一种特殊感情，认为法国是美国的天然盟友，而英国是美国的必然竞争者。对于法国大革命，他满怀喜悦，但是他主张采取温和立场，反对使用暴力，甚至认为法国可以保留权力受到限制的国王。尽管杰斐逊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和判断有某些失误，但是他对法国的友好感情和美好回忆，使他多年后还把法国当做他的第二故乡。

杰斐逊 1789 年 11 月从法国归来，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国务卿（1790～1793 年）。在他的从政生涯中，这一段时期是他感到失望的日子。他的政见与财政部长、有强烈亲英思想的汉密尔顿存在严重分歧，根本分歧在于：①杰斐逊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农业理想国，汉密尔顿主张建立工业化的美国；②杰斐逊强调州权，主张分权；汉密尔顿致力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作为总统的华盛顿虽然尽力调和他们两人的矛盾，但在许多重大决策上支持或偏向汉密尔顿。杰斐逊在 1793 年末辞去国务卿职务，退隐蒙蒂塞洛庄园，韬光养晦，伺机出山。1796 年杰斐逊与约翰·亚当斯竞选共和国第二任总统，以 3 票之差落败而屈居副总统。4 年后，在 1800 年大选中，经过美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众议院 36 次投票以打破杰斐逊与另一候选人伯尔得票相等的僵局后，杰斐逊才终于当选为美国第三任总统，而起到关键作用的竟是他的政敌汉密尔顿，因为汉密尔顿认为伯尔人品不端，不是块当总统的料。

作为州权主义者，杰斐逊上台后当然支持州权，但也并没有把联邦党的官员大批解职，保持了政府的团结。他废除了一些为人诟病的联邦法令，如处置外侨与惩治叛乱法，取消了曾引起“威士忌酒暴动”的联邦酒税等。但是杰斐逊在他任期内最引人注目和有深远影响的是购买路易斯安那（包括现在的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密苏里、艾奥瓦、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新墨西哥、

科罗拉多、怀俄明和蒙大拿各州的全部或部分)，面积达 82.8 万平方英里，使当时美国领土面积增加了一倍。这次“购买”的背景是，在北美拥有广阔殖民地的拿破仑急需现金来准备同英国打仗，因此主动提出愿意向美国出售整个路易斯安那，而且索价仅 1500 万美元，每英亩不到三美分。这时，杰斐逊一反过去坚持的法制观念，不经国会同意，先斩后奏，买下了之后再让参议院追认。正是由于杰斐逊的这一违宪行动，使美国轻易地打开了西部的大门，为美国成为连结两大洋的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杰斐逊为美国立下了大功，不过，在杰斐逊在世的时候未必认识到了他这一行动对美国成为美洲霸主的重要意义，因为据说杰斐逊决心买下这一大片土地是为了想使它“成为农民的乐园及世界上受苦的人民的避难所”。

1804 年杰斐逊顺利连任总统。在这一任期中，杰斐逊签署法令，从 1808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把奴隶输入美国，但实际上禁令未得很好执行，直到半个世纪后才真正制止了奴隶贸易。在他执政后期，在外交政策上出现一次重大失误，那就是在当时的英法之间海上战争中，杰斐逊采取了对两国实行禁运，这一政策反过来使美国对外贸易瘫痪，损失重大，以致国家处在反对禁运的叛乱和分裂的边缘。1808 年，杰斐逊在担任了 8 年总统后，主张废除禁运的麦迪逊当选为第四任总统。

66 岁的杰斐逊在退休后仍致力于美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和改革。1818 年，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弗吉尼亚大学开始建校工作，年已 76 岁高龄的杰斐逊亲自设计校舍蓝图，遴选建筑承包人，每天从庄园骑马下山到工地。除了这些具体工作之外，杰斐逊还亲自物色、聘请英国著名大学的一流教授来美任教。在他的主持下，弗吉尼亚大学取消了当时美国大学普遍设置的宗教课，并实行学生选修制，给予学生选读自己喜欢的课程的自由。1825 年 3 月 7 日，弗吉尼亚大学正式开学，这是他在自撰墓志铭上引为自豪的第三件事。第二年，1826 年 7 月 4 日，《独立宣言》发表 50 周年这一天，杰斐逊与世长辞，享年 83 岁。

美国人民十分尊敬和怀念这位充满理想主义、民主思想的伟

大政治家。1962 年美国《纽约时报杂志》举办的美国历史学家评选美国总统投票中，杰斐逊得票在威尔逊之下、杰克逊之上居第五位。

阿·德·托克维尔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出身于伊夫林省塞纳河畔的维尔内伊一个贵族家庭，高中毕业后去巴黎学习法律，深受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基佐的影响。大学毕业后进入政界并先后担任见习文官和凡尔赛初审法院法官。法国七月革命之后，他以考察新监狱制度为名去美国进行了为期九个多月的考察。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在美国的考察所得写成《美国的民主》一书，之后人生开始走向辉煌，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称号，并当选为人文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和法兰西学院院士。由于在政治学上的精深造诣，又先后担任众议院议员，制宪会议议员，国民会议议员，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等职务。在政治学方面的著作还有《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美国在全世界人民心中总是以两种想象出现，一方面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代表和现代自由政治制度的典范，吸引着无数双眼睛，成为其他国家青年向往的自由王国；而另一方面，她又给几乎全球各地的人民留下了“世界警察”的反面形象，她四处示威，以枪炮推行所谓的自由与人权。100多年前的《美国的民主》是专门探讨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著作，它为我们客观了解与研究美国社会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

全书分两卷。上卷的论述侧重于政府与政治方面。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美国民主的地理和社会背景，着重从整体上把握美国的民主政治。分别介绍了北美的外貌，英裔美国人的来源及其对未来的重大影响，英裔美国人的社会情况，美国的人民主权原则，各州的过去，美国的司法权及其对政治社会的影响，美国的政治审判，联邦宪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则相对具体地讨论了美国社会与政治各个方面的情况。分以下几章

来讨论：①为什么严格地说美国是由人民统治的；②合众国的政党；③美国的出版自由；④美国的政治社团；⑤美国的民主政府；⑥美国社会从民主政府获得的真正好处；⑦多数在美国的无限权威及其后果；⑧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⑨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⑩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下卷着重分析美国民主政治对美国一般风俗习惯、学术文化、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民主在美国对智力活动的影响；第二部分是民主对美国人情感的影响；第三部分是“民主对我所说的民情的影响”；第四部分是关于民主的思想和感情对政治社会的影响。尤其是第三部分讨论民主对美国民情的影响尤为精彩，分25章分别从民主对美国平民的人际关系、工资制度、家庭、年轻人、社会团体、社会革命、军队等方面深入地分析了美国民主对美国人民和社会的重大影响。

《美国的民主》中文版一般译为《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840年。这本书以其精辟敏锐的见解和优美而通俗易懂的文笔为托克维尔赢得了不朽的美名。本书可以说是研究民主政治的经典作品，也是以外国人身份论证他国内政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该书的成功源于作者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事实根据，书中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作者对美国各阶层人士的访问与直接考察，而很少依据文字材料。

《美国的民主》对法国的政治制度影响深远。法国采取代议制共和国，以平等和自由为基础，实行民主政治；实行适当的福利政策而不追求福利过度；普及文化；同时又特别注意法制的稳定与健全，要求高效率的政府部门等，都是以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善与恶的分析为基础。《美国的民主》还分析了法国和英国法制的区别，指出英国的政府缺少行政权，为英国宪法的新概念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美国的民主》的观察和分析方法为后人研究国家、社会与人民提供了光辉的典范。《美国的民主》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托克维尔提出的学说也在其他国家成为现

实。德国学者格奥尔格·耶利内克在他的《国家学说通论》中说：“在托克维尔的影响下，‘主权’分享学说，即联邦成员与联邦国家之间分享权力的普遍主张，才见于联邦的声明。”同时与《美国的民主》一样永垂不朽的还有书中体现的热爱自由的信念。

约翰·斯·穆勒

约翰·斯·穆勒（1806～1873年），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从小便受其父的极力栽培和熏陶，很早就开始信奉自由主义思想。继承了边沁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功利主义学说。其政治思想的中心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张既要维持个人主义所包含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权，又要使之适应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他把功利主义原则作为人们行为的道德基础，并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主要著作有：《自由论》、《论代议制政府》、《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论自由》通篇强调的宗旨是个人的自由。在穆勒看来，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应该没有限制，除非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或危害了团体的安全。他指出：“惟一名副其实的自由是指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我们自身的好处，只要我们不企图剥夺他人之事，或阻碍他人获得此事……人类似乎是对互相有利而允许各自生活的获利者，而并非对他人有利而迫使个人生活的获利者。”

穆勒深切关注所谓的“多数派人的专制”。就民主本身而言，他认为它并没有保证个人的自由，虽然其限制似乎比独裁统治稍好一些。穆勒论及“流行看法和感觉的专制”，即社会试图将其广为接受观念和行强加于那些拒绝接受的人身上。在他看来，社会专制比暴政更难抵制，因为其受害者“极难逃脱，（它）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奴役了灵魂”。穆勒认识到人类本性的特点是一个人会设法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他提出除非对科学、道德和神学问题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不然是不可能完全自由的。同时，他认为少数派的人数多少无关紧要：“如果全人类除了一人意见都一致，而这个人持相反意见，全人类要让此人保

持沉默并不比此人（如果有权的话）让全人类保持沉默更有理。”

穆勒认为，政治和社会进步大部分取决于思想的自由。从思想和观念的自由竞争中会产生接近“真理”的东西。既然对任何论题的盛行看法并不一定完全精确，“只有通过与其相反意见的冲突，才有可能去伪存真”。甚至错误意见也有社会价值，可以用来澄清正确的意见。他认识到，新的思想总是由少数派和个别天才提出的，因此，我们应允许它在“自由的气氛”中开花结果。

“真理总会战胜迫害”这一盛行的信念被穆勒驳斥为“一种人类代代相传的善意……而一切经验予以否定的谎言”。他说，历史上，“迫害产生了真理的例子比比皆是”。文中引用了宗教迫害的众多事例——表明“迫害总是成功的，除了异教徒是很强大的团体而无法予以迫害之外……这是种一厢情愿：真理，仅仅是真理，有排斥流行的错误、反对地牢和火刑的遗传力量。”

对自由有没有合理的限制？穆勒对用来煽动暴力的言论自由给予明确的限制。他宣称，“没人会妄称行为应与看法一样自由……当粮商使穷人挨饿，私有财产就是偷窃行为等观点在报纸上流传时，这是无关紧要的；但用来鼓动群众在粮商家门口闹事的话就应该受到惩罚。”穆勒认为，重要的区分在于，“无论对个人还是大众肯定造成的损害、或有肯定损害的倾向时，事情就离开了自由的范围而进入道德或法律的范围。”

《论自由》初版于1859年。它是西方民主政治最重要的阐述之一。该书以文理清晰、论证有序而著名，作者对人的幸福与权力的关注以及对政府当权者滥用权力而威胁人的幸福的担忧贯穿全文。需要指出的是，穆勒并非赞成绝对的自由，干涉别人自由、破坏他人幸福的“自由”是他所不能允许的。这些，使他的观点看起来执着而又中肯。

穆勒的这部著作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赞扬和推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个人的自由比中世纪更具危机，或完全被抑制。现代极权主义者无视公众和个人生活的区分，一味地使个人成为一部庞大的、非人性的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其一言一行皆受国家的控制。因此，穆勒坚信的人类通过思

想自由而进步的内涵，对历史的任何时期和对 19 世纪中叶一样重要。这使《论自由》历久常新，看起来倒像是为我们的时代而写的。

政府究竟是自然存在还是凭约定而存在？这个问题关系到政府形式的选择范围。如果政府完全是约定的，那么选择是无限的；如果政府完全凭自然而存在，那么选择是不可能的。穆勒不同意这两种主张，他认为要使人民支持某一政府，就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人们乐意接受这种政府形式；愿意并且能够为维持它存在所必需的事情；愿意并且能够做为使它能实现其目的而需要他们做的事情。检验政府好坏的一个标准是政府在增加被统治者的好品质的总和方面所能达到的程度，另一个标准是政府机构对大众的良好品质加以利用的程度，因此政府的目的就是造就更好的人民，而手段就是教育和利用人民达到最高的品质。穆勒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一个人民从被奴役到自治的过程。最好的政府就是能提供必要的条件，以教人民学习他们为了过渡到下一个更发达的社会阶段而必须学习的课程。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穆勒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代议制政府只有一个竞争对手，那就是专制政体。但是专制政府有两大弊端：在仁慈的专制政体中，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虽然个别的专制君主在某些情况下能保护个人权利，但是整个专制政体“在这方面是不可靠的”。历史证明，自由的民族比专制下的民族更为繁荣昌盛。二是专制制度要求公民的服从，即要求全体公民具有消极被动性。但是国家应该努力培育智力的、实践的和道德方面的优秀，却都是一种积极能动品格的产物。人民已经学习了为进步到更高的文明阶段而必须学会的服从，一旦人民学会了这一课，就应该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而这就不是君主专制所能认同，而只能依赖民治政府。代议制政府之所以是理想政府，正因为它维护个人权利，并促进他们道德和智力的最高发展。

穆勒相信专家治国，认为政府的职能是需要高度技能的活动，因此需要有经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从事这些活动，而民

众没有资格选择这些人。但每一个政府都有一个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最终控制权”，人民不直接运用这一权力，而是通过定期选举的代表来制约政府的运作，使其为公众利益服务。这样人民就在实际效果上掌握了这一权力。总之，穆勒认为代表并不是政府，而是代表人民制约政府。议会成为一个协商机构，是一个表明人民各种需求的机关和有关大小公共事务的所有意见进行辩论的场所。在代表机构和实际行政机构之间应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达到平衡的途径就是专家进行统治，但是必须受到人民代表的制约。

《论代议制政府》是穆勒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被认为是关于代议制政府形式的经典之作。该书发表于1861年，由于适应了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在当时就受到了社会的热烈欢迎，并且迅速广为流传。它曾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对世界的政治理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该书的论述全面而系统、严谨而又科学，语言生动形象，作者的观点与论述极为公正，使得该书成为同类著作中的一部精品，是较好地理解代议制理论和了解西方国家政府运作的最好读物。

亚伯拉罕·林肯

亚伯拉罕·林肯，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肯塔基州哈丁县一个农民家庭。当时，正处在西进运动时期，他们家不断向西搬迁，1830年，迁到伊利诺斯州的梅肯县。小时候，林肯家里很穷，他没机会上学，每天跟着父亲在西部荒原上开垦劳动。他自己说：“我一生中进学校的时间，加在一起总共不到一年。”

长大后，林肯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外出谋生。他什么活都干，打过短工，当过水手、店员、乡村邮递员、土地测量员，还干过伐木、劈木头的大力气活。不管干什么，他都非常认真负责，诚恳待人。据说，他当乡村店员时，有一次，一个顾客多付了几分钱，他为了退还这几分钱竟追赶了十几里路。

平时，无论劳动多么紧张，林肯都要挤出时间读些书。1832年，他参加伊利诺伊州议员的竞选，尽管演说很成功，但还是落选了。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伊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自学取得律师执照；次年，与人合作办律师事务所，成了一名青年律师，并获得了正直和廉洁的好名声。林肯一度加入辉格党，1847年，作为辉格党的代表，他进入国会。林肯青年时期就痛恨奴隶制度，因为他当水手时，多次运货到南方，亲眼目睹了奴隶主的野蛮残暴和黑奴遭到的残酷折磨。因此在国会期间，他曾提出了一个在哥伦比亚特区逐渐地、有补偿地解放奴隶的方案，但没有成功。1850年，美国的奴隶主势力大增，林肯很少参加政治活动，拒绝当国会议员，继续当律师。1854年，南部奴隶主派人进入新并入美国的堪萨斯，用武力强制推行奴隶制，引起了堪萨斯内战，南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一年，共和党成立，因为该党主张废除奴隶制，林肯就参加了，两年后他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他在竞选演说中说：“我们为争取自由和废除奴隶制度而斗争，直到我国的宪法保证言论自由，直到整个辽阔的国土在阳光和雨露下劳动的只是自由的工人。”但这次竞选没有成功。

1858年6月16日，林肯在同道格拉斯竞选总统时发表了题为《家庭纠纷》的著名演说，他把南北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比喻为“一幢裂开了的房子”。他说：“一幢裂开了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林肯的演说语言生动、深入浅出，表达了北方资产阶级的要求，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群众的愿望，因而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声誉。这次竞选最后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扩大了林肯的影响。1860年，林肯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11月，选举揭晓，他获得200万张选票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但在南部10个州，他没有得到1张选票。

林肯当选总统，使得美国南方实行奴隶制的诸州非常惶恐，因为众所周知，林肯是一个废奴主义者。当林肯走向白宫的时候，南北双方的矛盾已经非常激化，大有拔刀相向之势。林肯的前任对他说：“现在我可以轻松地度假了，你现在坐在火山口上面了。”这时，后来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却面对着分裂的局面，美国将来的命运随时都会改变，就在这个时候，林肯成为美国这艘巨轮的舵手。美国是走向分裂，还是走向统一；是走向工业化，还是走向奴隶制；是走向民主，还是走向压迫——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摆在了美国和林肯的面前。这一切将决定着美国的命运，如果美国从此走向一条光明的道路，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和俄国一个用犁、一个用剑来取代长期以来英国和欧洲主宰世界的局面，进而影响到世界的面貌。

林肯的当选，对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当然不愿意一个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当总统。为了重新夺回他们长期控制的国家领导权，他们在林肯就职之前就发动了叛乱。1860年12月，南方的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宣布脱离联邦而独立，接着密西西比、佛罗里达等蓄奴州也相继脱离联邦。1861年2月，他们宣布，成立一个“美利坚邦联”，推举大种植园主杰弗逊·戴

维斯为总统，还制定了“宪法”，宣布黑人奴隶制是南方联盟的立国基础：“黑人不能和白人平等，黑人奴隶劳动是自然的、正常的状态。”

1861年4月12日，南方军队炮击并于14日占领了联邦军的萨姆特要塞，挑起了内战（又称“南北战争”）。林肯不得不宣布对南方作战。林肯本人并不主张用过激的方式废除奴隶制，他认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先限制奴隶制，然后逐步加以废除，而关键是维护联邦的统一。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北方政府根本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只是仓促应战，而南方则是蓄谋已久，有优良的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所以，尽管北方在多方面都占有优势，还是被南方打得节节败退，连首都华盛顿也险些被叛军攻破。

北方在战场上的失利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许多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扭转战局。这时林肯才意识到，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废除农奴制、解放黑奴。

1862年5月，林肯签署了《宅地法》，规定每个美国公民只要交纳10美元登记费，便能在西部得到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之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这一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南方奴隶主夺取西部土地的可能性，同时也满足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大大激发了农民奋勇参战的积极性。

1862年9月24日，林肯召开内阁会议，公布预告性《解放宣言》。宣布：如果在1863年1月1日以前南方叛乱者不放下武器，叛乱诸州的奴隶将从那一天起获得自由并受保障。1863年元旦，林肯以总统身份，依据宪法所授予的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的职权颁布了《解放宣言》。正式宣布：仍在反叛联邦的各州及若干区域内，“所有被据为奴隶的人们立即获得自由，并且以后将永保自由，合众国政府和陆海军当局并将承认和维护他们的自由”；“获得自由的人们，除必要的自卫外，应避免使用任何暴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忠诚地工作”；合乎条件的人“将被容纳于联邦的武装部队”，为联邦服务。但《解放宣言》不适用于

没有参加叛乱的蓄奴州，对这些州的奴隶解放仍按 1862 年 4 月国会决议，采取自愿的、逐步的、有偿的方式实行。而且《解放宣言》是作为军事措施颁布的，没有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1865 和 1868 年，国会分别通过了宪法第 13、14 条修正案，才正式废除奴隶制。《解放宣言》是联邦成立以来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宣言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坚决支持和拥护。根据宣言，有 400 万黑奴获得自由。被解放的黑奴成为联邦军队得力的同盟军，此举使大批黑人奴隶参加了联邦军队，战争后期达到 18 万人，扭转了南北战争的战局，并保证了联邦政府夺得最后胜利。

这两个法令的颁布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战场上的形势变得对北方越来越有利了。

1863 年 7 月 1 日到 3 日，南北双方在华盛顿以北的葛底斯堡展开了内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北军重创南军主力罗伯特·李军团，南军 2 个旅长和 15 个团长全都阵亡，死伤 2.8 万人。北军伤亡也达 2.3 万人。李率军后撤。这次大战是内战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场上有棵树竟身中 250 弹。这一仗扭转了东线战局，从此北方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1864 年，北军向南方发起三路攻势。在东战场，格兰特采用消耗战略，经荒野战役、冷港会战，使李军团主力消耗殆尽，损失 3.2 万人，再无力进攻。在西线，谢尔曼指挥 10 万大军插入南方腹地，长途奔袭敌后方，于 9 月攻占南方最大工业城市亚特兰大。从 11 月 15 日起，又挑选 6.2 万精兵，发起“向海洋进军”，一个多月内大军长驱 300 多英里，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烧毁种植园、城镇和村庄，摧毁工厂企业，连铁轨都拆下来弄弯。南方到处火光冲天，一片废墟。12 月 21 日大军攻占了萨凡纳，完成了摧毁南方后方的任务。与此同时，北方海军也对南方实行“窒息式封锁”，完全切断了南方的对外联系。

1865 年，南方已山穷水尽，濒临崩溃的边缘。北军从陆海两个方向发起最后攻势，北军攻克重镇彼得斯堡和南方首都里士满，李军还剩不到 3 万残兵败将，4 月 9 日被迫向格兰特投降。

不久，南方残军 17 万人全部放下武器。北方取得彻底胜利。

此时，林肯在美国人民中的声望已愈来愈高，1864 年，林肯再度当选为总统。但不幸的是，1865 年 4 月 14 日晚，他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观剧时突然遭到枪击，次日清晨与世长辞，享年 56 岁。

亚历山大·赫尔岑

亚历山大·赫尔岑于1812年4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显赫的大贵族家庭。他是俄国19世纪解放运动中突出的作家、革命家、思想家。他的一生对于俄国革命起了伟大的推动作用。其父伊·阿·雅科甫列夫是沙皇禁卫军的上尉。其母是一个外籍女佣。两人由于相爱而走到一起，但是由于身份相差悬殊，父母一直没有举行正式仪式。但是两人相亲相爱共同爱护这个宝贝儿子，这是他们爱情的见证。“赫尔岑”原是德文中“心”字的音译字。

小赫尔岑在如此优越的环境中生活，但由于缺少玩伴和父母由于太爱他对他的管教又不严，所以，他就经常跑到农奴家中，跟下等人家的孩子一起嬉戏。他从小就感受到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凄苦与不幸，经常从厨房中偷一些东西给朋友们吃。小赫尔岑很小就懂事了。

后来，赫尔岑渐渐长大了，父亲不能再让他这样玩下去了。于是，给赫尔岑请来两位家庭教师，开始让赫尔岑学习。这两位教师对赫尔岑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一位是叫布梭的法国人，他曾经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他经常向赫尔岑讲述法国人民为了民主、自由而奋勇斗争的事迹。另一位是叫普罗托波波夫的俄国大学生。他经常给赫尔岑讲述革命性的，充满激情的诗歌。此外，赫尔岑的玩伴中，有几个他的亲戚朋友，也非常喜欢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在他们共同的成长中，小赫尔岑开始向往着革命。

当时的俄国依然是沙皇统治下的封建农奴专制制度的国家。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广大人民不堪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纷纷揭竿而起。1825年，十二月党人在首都彼得堡的参议院广场

举行了公开的武装起义，但很快被镇压下去。1826年7月13日，十二月党人的5个重要领导者被绞死，其他大批的起义者被流亡到遥远的西伯利亚。但是，这场战争拉开了俄国解放斗争的帷幕。赫尔岑当时只有13岁，这一声“为自由而斗争”的惊雷在赫尔岑幼小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29年，赫尔岑考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学习。在大学里，赫尔岑与社会上的革命组织有了更多的接触。他自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儿子”，并自己组织了一个政治小组，举行秘密的会议，热烈地讨论世界各国的政治活动，揭露俄国与世界各国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行为。渐渐地，赫尔岑成为小组中的领袖人物。

赫尔岑在学校中学习很刻苦。由于对俄国社会很多现象、制度产生怀疑，赫尔岑把自己埋入书的海洋中去寻找理论依据。他刻苦地研究社会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从而用完整的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开始对人类社会进行思索。

1833年7月，赫尔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论文《哥白尼太阳学说的分析》，获得了硕士学位与银质奖章。

毕业之后，赫尔岑依然参加政治小组秘密的集会，探讨各种新的社会思想。但是，由于被人告密，1834年7月，赫尔岑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小组中的奥加辽夫。由于这时沙皇反动统治已如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惊恐不安。因此，赫尔岑在没有任何确切罪名的情况下被流放到比尔姆省，后来又被送到维亚特加省。由此，赫尔岑对沙皇统治更为痛恨，经常愤愤不平，发誓要推翻它。1841年，沙皇特务截获了赫尔岑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信中，赫尔岑痛斥沙皇统治下的罪恶与黑暗，因此又被流放到诺夫哥罗德。

1842年，赫尔岑回到莫斯科。经历了苦难的流放生活，赫尔岑更为成熟了。他接连不断地在进步杂志《现代人》与《祖国纪事》上发表政论、文学作品与哲学论文，抨击农奴制的罪恶，号召人们起来投入到“为自由而斗争”的战斗中去。这一时期，赫尔岑还发表了小说《谁之罪》与《偷东西的喜鹊》等小说。

早在1841年，赫尔岑就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谁之罪》。小说

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以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采弗尔斯基为主人公。他应聘担任地主涅格洛夫家的家庭教师，指导地主的儿子莱沙的功课。因为他潇洒的仪表、富有磁性的声音，充满青春的智慧与热情的眼神，地主涅格洛夫年轻漂亮的妻子对他产生好感，经常主动关心克鲁采弗尔斯基的生活。但是克鲁采弗尔斯基不爱她，而是爱上地主涅格洛夫的女儿柳邦卡。柳邦卡也被他的丰富的知识与先进的思想所吸引，两人相爱了，这引起涅格洛夫妻子的嫉妒。她总找一些小事给克鲁采弗尔斯基制造麻烦。涅格洛夫一直把克鲁采弗尔斯基看作情敌，巴不得他有个喜欢的女子，于是很快答应了他与自己女儿柳邦卡的婚事，并且在城里替克鲁采弗尔斯基找到一个中学教员的职业。下部以贵族青年别尔托夫为主人公。别尔托夫是一个热情的具有革命精神的贵族青年，他与克鲁采弗尔斯基一家认识，并且爱上了柳邦卡，他认为柳邦卡身上有一种非凡的力量。她第一次让他认识到什么是爱情的力量，什么是一种幸福。柳邦卡虽然是真心爱着克鲁采弗尔斯基，但现在由于贵族青年别尔托夫的出现，她发现了别尔托夫身上具有一些克鲁采弗尔斯基身上所消失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能让她产生新的思想和感情，为她的心展开一个新的世界。她忍受着精神的折磨。而克鲁采弗尔斯基由于深爱着柳邦卡，把其他的一切都荒废了。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也十分抑郁，每天借酒消愁。别尔托夫爱上了不该爱的人，破坏了别人的幸福，也非常地苦闷，不得不出国去逃避这种矛盾。小说最后以一种悲剧性的忧伤情绪结束。小说提出了一个问题“谁之罪”？把矛头指向了罪恶的社会制度。

而另一部《偷东西的喜鹊》以一个农奴出身的演员安涅塔为主人公。她的主人赏识她的才能，出钱让她学习，带她去意大利与巴黎学艺并且演出。但由于主人突然死去，剧团被另一个地主斯卡林斯基公爵买了下来。他垂涎于安涅塔的美色，想占有她。他用物质引诱安涅塔，被严词拒绝。这个人面兽心的老家伙意欲闯入安涅塔的卧室，想用强力占有她。安涅塔把他引到镜子面前，让这个公爵看着自己丑陋的面目，说宁愿自杀也不要他这样丑恶的人。公爵恼羞成怒，大骂安涅塔，说农奴是主人的财产，

她只是他随意摆布的东西。后来安涅塔爱上一个农奴演员，怀了孕。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成为一个让人随意摆布的奴隶，她服毒自杀了。

赫尔岑在他的小说中以下层劳动人民为主人公，赞扬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同时谴责了上层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

1847年，赫尔岑的父亲病故。他继承了巨大的遗产，成为一个富裕者。他更加渴望着革命的自由，但是在俄国，各种思想言论控制得更为严密。赫尔岑为了寻找革命的出路，于1847年3月底来到了法国巴黎。

后来意大利爆发了青年意大利党的领袖马志尼与加里波领导的革命运动，赫尔岑赶到意大利参加了意大利人民所进行的罗马大游行。后来，1848年法国也爆发了革命，赫尔岑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赶回法国，参加了法国人民举行的巴黎示威大游行。但是，起义被反动势力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由于赫尔岑参加了罗马和巴黎的大游行，法兰西政府把他当作危险分子，将他驱逐出境。这时，沙皇勒令赫尔岑回国。赫尔岑明白回国之后必然受到监视甚至流放，于是，他不听从沙皇的命令，全家迁到了瑞士，并加入了瑞士当地的农民协会。

赫尔岑经过大量的理论、经验总结，认为人民才是社会的根本力量，不能把政府与人民混为一谈。他要让世界了解俄国，认识俄国人民斗争的现状。他写了《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今日世界与俄罗斯》等等介绍俄国的作品。由于赫尔岑与俄国沙皇专制统治一直为敌，俄国政府决定，从1851年3月22日起，剥夺赫尔岑的一切权利，终生驱逐出境。从此，赫尔岑丢掉了贵族身份及各种荣耀，他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但是，赫尔岑却非常高兴，他觉得自己为俄国解放事业做的努力取得了效果。“这是让人兴奋的事”，他这样说。

1851年6月，赫尔岑一家又搬到法国南部定居下来。由于家庭连遭不幸：母亲与儿子因沉船而丧生，妻子又病逝，赫尔岑伤心至极，但他很快从灾难的哀痛中恢复过来，投入到斗争中去。

1852年8月，赫尔岑来到伦敦。首先，他创办了一个自由俄

罗斯印刷所，专印宣传用的俄文刊物。

1855年，赫尔岑着手创办了一种定期刊物杂志《北极星》。在创刊号上，赫尔岑以十二月党人五领袖的侧面像作为封面，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传统，刊印了大量在沙皇严密监控下不能发表的作品，例如普希金等人的政治诗等。

1856年，赫尔岑的战友奥加辽夫也来到此地。在他的帮助下，又增加了一个定期文集，主要刊登来自俄国的信件，称之为《俄罗斯之声》。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刊物仍不能满足斗争的需要。1857年7月1日，赫尔岑又创办了《钟声》。在这个革命的火焰正慢慢燃烧起来的日子里，赫尔岑以深刻的理念为指导，紧密配合国内的革命斗争，发表了许多专论文章，如《俄国的革命》、《解放的果实》、《给未来朋友的信》等等。这些刊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吸引了无数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人民读者。同时，它竟能越过沙皇边防警戒的重重封锁，送到俄国各阶层手中，甚至连主教与沙皇的宠臣也都人人有一份。由此可以看到这些刊物的巨大力量。

但是，在俄国革命热情逐渐高涨时期，由于赫尔岑远居国外，不了解俄国革命的真实动向，曾经与国内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现代人》杂志产生了一些分歧。1859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带着和解的心情来到伦敦与赫尔岑亲切地交谈，交换了彼此的意见，最终达成共识。这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赫尔岑联手合作，一个国内，一个国外，更大地发挥了斗争的力量，终于迫使沙皇进行改革。但是改革之后，赫尔岑清醒地看到沙皇改革的实质。他在《钟声》中写道：“解放是一种骗局”，“沙皇用虚构的解放使人民开了眼界。”从此，他对沙皇统治制度进行更为激烈的斗争，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号召士兵转到人民的一边，强调组织革命秘密团体的必要性。赫尔岑利用《钟声》对人民的斗争起了指导性作用。

此外，赫尔岑清楚地看到了自由派的反人民性，对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揭露。果然，以卡维林之流为代表的自由派看到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感到害怕。他们就以造谣诬蔑、叛变投敌的方

式挑拨政府迫害民主派。1862年，政府封闭了《现代人》与《俄语报》等进步报刊。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被逮捕、流放。

1867年，在《钟声》创刊十周年的时候，这个刊物与读者告别了。赫尔岑说：“每一代都有它自己要做的事，我们这一代所应当做的是准备革命的工作。”又说：“新一代已经成年，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他们不需要我们的言论，我们没有什么对他们好说的了。”

《钟声》停刊之后，赫尔岑开始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应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已认识到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剥削性。到了晚年，赫尔岑终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还要坚持起来继续进行斗争。但是，长期的革命工作已损害了他的身体。

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因患肺炎在巴黎与世长辞了。

这位出身贵族的平民革命家以其一生不懈的革命斗争为俄国革命开辟了一条道路，把革命斗争的种子播入每一个受压迫的人的心中。他的功绩将被历史所牢记。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德国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科学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

马克思 1818 年 3 月 5 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一个律师，母亲原籍荷兰。马克思在本城接受中等教育，1835 年中学毕业后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翌年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马克思对哲学和历史最感兴趣。在大学阶段，他参加了倾向进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在政治上他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1841 年，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论文，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时，他还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上。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本想做波恩大学哲学教授，由于为普鲁士当局所不容，于 1842 年成了科伦《莱茵报》撰稿人。同年 10 月，他迁居科伦，担任该报主编。11 月间，与恩格斯首次会见。由于主持《莱茵报》时发表的文章触怒了普鲁士当局，马克思于 1843 年 3 月 17 日声明退出编辑部。

为了避开普鲁士政府的迫害，马克思于 1843 年 10 月移居巴黎。他与当地的工人组织及德国流亡法国的“正义者同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844 年，马克思在他与卢格合办的《德法年鉴》杂志上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论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这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标志：这一年 8 月，恩格斯来到巴黎。从此两人为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并肩战斗。他们合作写成的第一部著作是 1845 年出版的《神圣

家族》，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

1845年，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为此他迁居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后，两人曾去英国作短期的考察旅行。返回布鲁塞尔不久，便开始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方面从事研究著述，一方面参加工人运动。1846年，他们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对蒲鲁东主义、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展开斗争。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将“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为同盟起草了纲领。1848年2月，新纲领在伦敦用德文发表，这就是科学共产主义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宣言完整、系统而严密地阐述了他们的伟大学说，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极大震动。3月，马克思被比利时当局驱逐，返回巴黎。

德国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回德国参加革命。6月，由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在科伦发行。该报声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对各国反动派。次年他与恩格斯被以“煽动叛乱”罪受审。这样，马克思再次被逐，于6月3日到巴黎，8月26日左右到伦敦。

在伦敦，马克思一边从事工人运动，一边从事研究工作。为了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他先后写了《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重要著作。

1864年，英、法、德、意、波兰等国工人代表在伦敦集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马克思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担任德国通讯书记，在第一国际内，他和恩格斯一起，同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起草了《法兰西内战》宣言。

马克思很早就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详尽论证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1867年，不朽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二、三、四卷在他逝世后出版）。

贫穷、疾病和长期过度的劳累，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寓所与世长辞。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与马克思并驾齐驱的伟大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革命家，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伟大导师。

恩格斯 1820 年 11 月 28 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一个纺织工厂主家里。他的父亲一心想要恩格斯继承自己的事业。1837 年恩格斯中学还未毕业，父亲就强迫他弃学经商，到本城商业营所当办事员，一年后又送他到不莱梅一家大公司供职。然而恩格斯却喜爱哲学、文学和历史，对商业活动完全没有兴趣。在不莱梅的三年间，其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研究思想学术和实际问题上，1839 年发表《乌培河谷来信》。

1841 年秋，恩格斯去柏林服兵役，服役期间与“青年黑格尔派”建立了联系。当时柏林大学学术气氛非常活跃，恩格斯时常抽空到柏林大学旁听，并写了《谢林和启示》等文章，对该校哲学教授谢林的反动的神秘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

1842 年，恩格斯服役期满到英国曼彻斯特的父亲与人合办的工厂去任职，途经科伦，在《莱茵报》编辑部第一次会见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的近两年中，除了经商，恩格斯着力考察英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还与流亡在英的正义者同盟建立了联系。他经常深入到工人当中了解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还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1844 年，他在马克思主办的《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表明他已由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这年 8 月底，恩格斯回国途经巴黎第二次会见马克思，两人拟订了合作计划。他们合作写的第一部著作是 1845 年 2 月出版的《神圣家族》。同时，恩格斯又于 1845 年 3 月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

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后不久，恩格斯也到了那里。他们一起到伦敦和曼彻斯特作了短期考察，返回布鲁塞尔后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翌年，他们共同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对蒲鲁东主义、平均共产主义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斗争。

1847年，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共同起草了“同盟”的纲领，这就是科学共产主义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

德国革命爆发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回普鲁士参加斗争，他任《新莱茵报》的副总编。革命失败后，德国南部和西部各省又发生武装起义，恩格斯亲身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他负责筹集军粮和弹药，训练战士，并英勇地参加了四次战斗。

恩格斯后来来到英国伦敦与马克思重建了“共产主义同盟”的各级组织。为了在经济上资助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工作，他于1850年重返曼彻斯特从事商业活动。在这之后20年间，他几乎每天同马克思通信，讨论理论和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为了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恩格斯写了《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两书。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恩格斯未参加领导工作，但他和马克思一起，同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

1870年，恩格斯回伦敦与马克思一起领导第一国际。恩格斯从1877年起至1878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杜林的反动观点进行全面批判，这些文章汇集成书，便是著名的《反杜林论》。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担负了整理和发表马克思的文献遗产和继承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任。1885和1889年，分别整理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三卷。1884年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8年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9年，“第二国际”建立。恩格斯指导它的活动，同其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1891年又写了《爱尔福特

纲领草案批判》。晚年，他给各国活动家写了大量书信，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原理。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在伦敦因病逝世。

查理·达尔文

1859年，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发表了！在这本书中，达尔文提出并详细地阐明了生物进化学说。在19世纪的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据说，有一位贵族小姐在听说人类是由猿变来的这一理论时，竟然吓得当场昏倒了。生物进化论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一种理论，也是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查理·达尔文出生在距英国西海岸约100公里的古城施鲁斯伯里，他父亲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是一个很有声望的医生。他在这个古城近郊建筑了一座三层红楼房，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就在河畔的红楼房里诞生了。

达尔文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他8岁时进学校读书，他的学习成绩一直赶不上妹妹，却对搜集动物、贝壳、硬币和图章感兴趣，特别喜欢自然史，努力研究植物的名称。他对严格的古典教学方法极其反感，而对校外活动非常感兴趣。他对地方动物志相当熟悉，精心阅读鸟类方面的书籍，对鸟的习性进行观察，并做出标本。他还迷上了化学实验和打猎，和哥哥整日里做化学实验，同学们便给他起了个“瓦斯”的外号。

一次，在校长的坚持下，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不得不把儿子领回了家。他愤怒地痛骂儿子：

“你念念不忘的就是打猎、养狗、养猫、捉老鼠、抓虫子、玩瓶子、采花草，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出息？不但丢尽了你的脸，也玷辱了全家，你会成为让人痛心的败家子的。”

面对校长的责备和父亲的痛骂，达尔文只是淡淡一笑，心里不服气地说道：我可不是不可救药的人。我热爱科学，我有信心

一定能在大自然中捕捉前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你们等着瞧吧，我一定会为达尔文家增光的。

达尔文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所有这些压力对他来说都无济于事，兴趣广泛的达尔文依然其乐无穷地酷爱着那些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干的勾当”。

这一天，达尔文剥开一棵老树皮，突然发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昆虫，他十分惊喜地捉了一只。

这时，从旁边的树皮里又钻出了一只甲虫。达尔文看见了，立刻想得到那只甲虫。于是他立即把手中的昆虫放到嘴里，腾出手来捕那只甲虫。突然，达尔文叫道：“哎呀！鬼东西！”

原来，口里的甲虫分泌出一种辛辣的毒汁，把他的舌头刺得钻心地疼。平日里，达尔文沉默寡言，他总是不失时机地窥视着自然。

有一天，他走在古城堡的城墙上，像往日一样，他一边走一边陷入了对自然的冥想。他若有所思地迈着步子，突然一脚踩空，从城墙上跌了下去，这时，达尔文仍然还在思考着。亲眼见到他摔下城头的人们，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内，都认为被摔死是无疑的了。出乎意料的是，他却奇迹般地安然无恙。在这场虚惊中，他悟出了一个科学道理：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毫无预料的跌下去的一刹那，在我头脑中闪过的念头的数目却是惊人地多。这一切，和生理学家们所提出的每个念头需要可观时间的说法是不相符的。”

1825年，父亲把达尔文哥俩送进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大学的授课情况使达尔文大失所望，几乎所有的课都极其枯燥，他喜欢的只有化学课，后来他又钟爱上了自然史，并与教授詹姆斯交上了朋友。

达尔文经朋友汉斯教授的推荐，登上考察美洲东西海岸的“贝格尔”号舰，当了随船的生物学家。他开始了环球航行。

“贝格尔”号以每小时七八海里的速度前进，达尔文被晕船折磨得晕头转向。他坚持着和船上的人聊天，以减轻晕船的反应。有时，他阅读旅行家们描写热带自然界的著作来转移注意

力。“贝格尔”号终于来到热带，达尔文抓紧在风和日丽的天气，用小网捕捞浮游生物，几天的功夫，甲板上便堆积如山了。负责管理船上清洁和美观的韦克姆上尉看着这堆“垃圾”，非常气愤地说：“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弄来这些垃圾让大家作呕！”

达尔文却如获至宝，他整日里研究和观察着这些“宝贝”。

一天，“贝格尔”来到佛得角群岛中最大的普科亚港。达尔文望着光秃秃的平原，上面布满了一堆堆晒焦了的岩石。他为这奇异的景象所吸引。他到处奔跑，听到了熟悉的鸟鸣，从来没见过昆虫在花间飞舞。这意想不到的收获令达尔文疯狂地奔跑了三天，他深深地被这新颖的热带大自然完全吸引住了。那些热带植物、各种鸟、色彩鲜艳的海洋生物使他心胸豁然开朗！

接着，达尔文又来到巴西的第二站巴伊亚市。展现在眼前的风景使他目瞪口呆。他在那里停留了20天，游览了热带森林，收集了昆虫和植物，亲眼看到这里都是由奴隶贩子贩卖到此地的黑奴构成的居民区，狂欢节是这里最热闹的日子了。达尔文那和蔼的笑容和有趣的交谈博得了黑奴们的尊敬，人们亲切地喊他：“亲爱的老哲学家，参加我们的狂欢节吧！”

达尔文欣然接受了，他与黑奴们尽情地狂欢着！

1836年10月2日，“贝格尔”舰终于在英国靠岸，达尔文也满载而归。他谢绝了担任待遇丰厚的英国地质学会秘书的邀请，用了两年的时间，埋头整理他的考察日记和各种标本。1839年至1846年，他的《航海日记》、《贝格尔舰航行中的动物学》、《火山岛的地质考察》、《南美洲的地质考察》等著作相继出版。1859年，他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

在这部科学巨著里，达尔文以充分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向人们表明“物种不是不变的”，一切生物都由少数生物进化而来，生物的进化是自然选择、历史作用的结果。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的说教，把生物学第一次从神学束缚下解放出来，将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重大发现之一，《物种起源》一书问世，标志着达尔文进化论的确立。

《物种起源》像一颗重型炮弹炸在欧洲神学阵地上。上至英国自相，下至御用文人，都群起而攻之，甚至一些昔日的朋友和老师也因观点分歧变成他的仇敌，但以赫胥黎为首的进步学者则坚定地支持达尔文。

1860年6月30日在牛津图书馆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牛津大主教跳上讲坛，严厉地斥责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以谩骂的口吻质问道：“赫胥黎先生，你相信猴子是人类祖先，那么请问你，你自己是由你祖父的还是你祖母的猴群中变来的？”说完后，在助威者的哄笑声中回到座位。赫胥黎从容走上讲台，有力地回击了大主教的挑衅：

我再强调一遍，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他祖先是类似猴子那样的动物而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开河，他不但满足于自己事业中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就，而且还要干涉他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在欧美，到处都出现了这样的辩论和论战。

随后，达尔文又发表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等书，对人工选择作了系统论述，并提出性选择及人类起源的理论，进一步充实了进化学说的内容。到19世纪70年代，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普遍为学术界所接受。

到了晚年，达尔文疾病缠身，即使这样，他献身科学的热情也丝毫不减，又写出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食虫植物》、《植物的自花受精和开花受精》等几部著作。在逝世前一年，他还写了一本《蚯蚓对土壤形成的作用》呢！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他安详地死在了他的妻子爱玛身边。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生物学家，他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牛顿的墓旁。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28年7月24日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城的一个神父家庭。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家庭，是一个爱好读书、勤恳劳动、人人相互尊重的和美家庭。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学教育，是在家里由父亲手把手进行的。从8岁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开始了有系统的学习。

1842年，13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优异成绩，考入自己家乡的萨拉托夫教会中学。

1846年春，18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没等在教会中学毕业，就私自决定彻底放弃父亲要把自己培养成神职人员的计划，离开家乡萨拉托夫到彼得堡去投考大学了。这一年夏天，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彼得堡大学的文史系。

1846年~1850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时期唯物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形成阶段。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1848年10月开始接触黑格尔辩证学说的。当时他正在大学读书，不过，他所读的是黑格尔左派米什列撰写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新哲学史》。这本书曾经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倾向于黑格尔哲学。他非常赞赏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方法。

5年的大学生活，不仅使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获得了许多渊博丰富的基础知识，而且，他还开始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后来火热的革命运动当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形成了自己坚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并为此奋斗了终生。

1855年，车尔尼雪夫斯基重返彼得堡后，经革命组织介绍到

第二军官学校任教，并且成了当时著名的杂志《现代人》的撰稿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它是用唯物主义的原则与观点撰写的美学论文，其内容充满了革命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在这篇论文当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刻地分析与批评了当时流行于美学中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传统。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文中，还充分地揭露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口号的虚伪本质。并且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主张文艺要面向生活、走进生活，给现实生活作判断，充当“生活的教科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观点，恢复和大大发展了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别林斯基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对世界性的进步文艺，指明了要为改造现实服务的正确方向。

1855年的11~12月车尔尼雪夫斯基相继发表了自己的文艺批评名著《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一书的前几章。这部著作直到1856年底才连载完毕。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围。实际上，它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缩写的一部19世纪30~40年代的俄国社会思想史。他在这一著作中，不仅坚决捍卫了别林斯基和果戈里的宝贵思想，充分发挥了别林斯基的革命的艺术思想，同时指出进步文学的任务就在于：自觉地为改造现实的人民解放运动服务。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但表明自己不愧是别林斯基卓越的继承者，而且还站在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首次提出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这一著名论断，为哲学理论界提供了辩证地对待现实的范例。因此，国际学术界的许多著名人士都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著作是一份独特的革命理论宣言，它宣布了新的革命民主派的最重要的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的基本原则。

1859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迷信与逻辑规则》一文中，在揭露了俄国社会现实中大量的罪恶事实之后，还进一步指出，造成俄国农业落后状况的根源，是由于俄国农奴制的存在。

此外，车尔尼雪夫斯基还用文学作品宣扬自己的革命观点。

伟大导师列宁也非常喜欢其文学作品《怎么办》，他认为一切毁谤这部作品的言论都是不可容忍的。列宁在一次谈话中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这种文学能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我在一个夏天里把《怎么办》读了五遍。每一次都在这个作品里发现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

福泽谕吉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有位启蒙思想家，他“给予国民的影响之大，恐怕比所有其他启蒙思想家之和还要广泛、深刻”。此人便是福泽谕吉。在日本有启蒙性质的“文明开化”运动中，他充当旗手，扮演了一个巨匠角色，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

福泽谕吉 1835 年出生在中津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早年丧父。少年时代的福泽谕吉一面从事家务劳动，一面学习汉文，阅读了父亲留下的大量文学书籍。福泽谕吉对幕府那套封建等级制度深感不满，总觉得那些封建思想不合时宜。

1853 年 7 月的一天，由四艘炮舰组成的美国舰队在柏利少将的率领下，强行闯入日本的浦贺港，要求同幕府将军就开港进行谈判。柏利声言，如不同意，“立即交战，以决定胜负。”长期生活在闭关自守环境中的幕府官员，很少看到这种冒着滚滚黑烟的大炮舰，惊惶失措之余，只得同意开港。第二年，日本被迫在神奈川签订了开港贸易的《日美亲善条约》。接着英国、俄国、法国也相继闯进来，日本紧闭的国门被强力打开了。日本的封建社会犹如长期密封在棺材中的木乃伊，突然遇到外界的新鲜空气，迅速开始变化。

日本许多有思想的下级武士看到西洋人的威风，这时产生了了解世界的想法。同时，他们看到平素骄横的幕府官员，在西洋人面前却束手无策，感到异常气愤，因而又萌生了要求变革的思想。

这一事件对福泽谕吉震动很大，促使他立志学习西方文化。他怀着振兴日本的抱负，先后在长崎、大阪、江户等地学习荷兰语和英语；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多地学习了各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不久，他在江户开办了一所荷兰语学校。

福泽谕吉一直渴望着能到国外参观访问，直接了解西方社会的情况。从1860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的翻译前往美国开始，他曾3次出国，历访英、法、荷、普、俄、美等国。多次出国访问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看到日本与欧美各国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期望能尽快把西方文明之风带回国内。因此，他在出访期间，用点滴节省下来的外汇，购置了大批外文书籍，包括各种辞典，其中许多书籍后来被广泛采用为教科书。

日本被迫开港后，社会上“攘欧论”盛行。福泽谕吉因倡导学习西方文明，处处受到传统势力的猛烈攻击。就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仍以很大的胆略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为日本的文明开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从1862年起，福泽谕吉连续发表了60多种著作，其中以《西洋事务》、《劝学篇》、《文明论概略》最负盛名，它们是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作，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西洋事务》一书完全是根据福泽谕吉的访问笔记写成的，它详细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向日本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社会的窗户，成为轰动日本全国的畅销书。当时日本朝野凡是谈论西方文明、主张开港的人，案头都有这部著作。

1872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被称为“明治的圣经”的重要著作——《劝学篇》，吹响了日本向近代社会进军的号角。在这部著作中，福泽谕吉用通俗的语句指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人生而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他敦促国人要多读书，多接触新事物，钻研对社会真正有用的学问。他认为一国文明事业的成功，取决于每个人立志学问，充实力量。他主张放开眼界，将东西方事物进行比较，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取其可取，舍其可舍，取得真理。《劝学篇》力排传统思想，宣传功利主义和进取精神。福泽谕吉将批判矛头指向幕府，认为妨碍个人身心独立的是亚洲的专制主义和日本的幕府统治。因为“国家权力集中于王室”、“人民不专于国事”、“国民的地位不受尊

重”、“无信仰宗教权”、“无研究学问权”；进而告知那些处于卑屈之中的人们，要想走上独立的道路，必须立志向西方学习，树立文明精神，把不切实际的学问视为次要，专心致力于接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学。他认为，只要掌握了这样的学问，增长了见识，“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福泽谕吉号召人们打破传统的“轻视钱的习俗”，因为“争利就是争理”。这对日本后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制度，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这本书一出版，人们争相购阅，销量多达70余万册，对日本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福泽谕吉全面提出了学习西方文明的主张。他把世界上多元文化归结为三种类型，即野蛮、半开化和文明，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按照由野蛮到半开化到文明的次序向前发展的。在他看来，当时的日本处于半开化，而欧美已进入文明。因此日本必须“以西洋文明为标准”，学习欧美。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他说明了落后必然挨打的道理，“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为先进的所压制。”但是，福泽谕吉并不一味崇洋媚外，只是强调要学习其中“一种无形的东西”，即“文明的精神”。他说：“使欧亚两洲相比，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他告诫人们“不应单纯地仿效西洋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

福泽谕吉还是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私立大学的创始人。1868年，他创办了“庆应义塾”，后来又不断扩充，建成为日本的第一所西式学校。这所宣传文明开化的基地，为日本的维新改革事业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他因此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为了从根本上打破日本闭关自守的局面，福泽谕吉极力主张通过兴办教育，使日本逐渐走向文明社会。他主张以推进日本社会文明进步作为办学宗旨。为此，他强调学校应讲授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

说。

福泽谕吉启蒙思想如同激荡的洪流，冲击着封建幕府体制和陈旧的社会意识，因而深得明治政府的赏识。他的启蒙思想被资产阶级加以改造、利用，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作为日本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福泽谕吉的视野又是狭隘的，他不可能去关心下层民众疾苦，甚至主张用宗教来愚化人民，使人民俯首听从资本家的摆布。明治维新后，福泽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对内主张“官民调和”论，对外则为日本扩张开脱，公开宣扬“日本肩负文明教师的责任……应把朝鲜带进文明世界”，鼓吹要把中国和朝鲜“包括到我文明圈之中”，暴露了他的局限性。他的启蒙思想本质上是为日本资产阶级服务的思想工具。

威廉·詹姆士

威廉·詹姆士（1842～1910年），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出生于纽约，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富商。先后在美国和欧洲受过长期的多种专业教育，并在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哈佛教授生理学、解剖学和心理学等课程。在先后出版《心理学原理》和《心理学简明教程》两本心理学著作后，将注意力放在了实用主义哲学上。其哲学著作有《实用主义》、《多元的宇宙》、《宗教经验之种种》、《真理之意义》等。

《实用主义》一书共收集了8篇讲稿，具体论述了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对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和真理观等。

（1）反对形而上学。詹姆士声称，实用主义继承了近代经验论以及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传统。他把所有反对“绝对”、“物质”、“实体”等形而上学概念的哲学家都视为实用主义的思想先驱或同路人。詹姆士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是“无用”、“抽象”的同义词，他还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可恶，在于它是一种不近人情的、不道德的哲学。他还认为，形而上学虽然无意义，但实用主义从实际效果出发，将形而上学概念带到生命的绿丛中，把它们的价值兑现出来，也可以使之成为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尤其在宗教领域更是如此。此外，他还认为，哲学家的思想和他们的气质密切相关。

（2）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詹姆士指出：“实用主义的范围是这样的——首先是一种方法，其次是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发生论。”他说“实用主义不代表任何特别的结果，它不过是一种方法。”实用主义方法的功用，首先在于解决形而上学的争端。简言之，

实用主义对于形而上学的抽象原则不感兴趣；一切从实际效果出发，从事实出发，这才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论。

(3) 实用主义是一种关于真理的理论。在詹姆士那里，实用主义除了作为一种方法之外，更重要的它不是一种真理理论。他的真理观是：①真理是有效用的工具；②是对观念符合实在的独特理解；③真理是一个过程；④真理需要有一种“信用制度”。

正如美国哲学家卡伦所指出的，詹姆士在《实用主义》中所阐述的思想，充分体现了美国人民对美国的状况的自由反应，代表着美国人自由、冒险、努力、新奇及一种不确定的未来。

《实用主义》一书是詹姆士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实用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全称是《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由詹姆士于1906年11、12月在波士顿罗威尔研究所和1907年1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几次讲演汇集而成。全部照原讲稿付印，未加任何发挥或注释。正因为如此，它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重复，在一些地方显得比较简单，只限于提出观点，未能展开充分的论证。所有这些都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詹姆士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实用主义》一书是他哲学成熟时期的著作，不但集中体现了詹姆士本人的思想，同时也是整个实用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弗里德里希·尼采

弗里德里希·尼采，德国人，19世纪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他以其惊世骇俗的勇气开辟了西方思想史的新纪元，他的思想至今仍影响着西方思想的发展。

尼采1844年出生于德国东部吕茨恩市附近的勒肯村。他的家庭是一个虔诚的新教牧师家庭，贵族出身，和普鲁士国王同宗。

尼采出生时头大身小，并且身体差，有神经痛、头晕、眼花等各种毛病。在他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父亲与病魔搏斗，终于力竭而死的场景给尼采以深刻的印象，并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

父亲去世后，教养尼采和他妹妹的责任主要落在他的母亲、祖母和两个姑妈身上。他的姑妈喜怒无常，母亲固执偏见，这无疑影响了尼采那种躁郁性格的形成。而且尼采整日生活在女人堆里，从小就养成了女性化的心理状态。他小时候就很弱的身体由于不能参加运动更加虚弱，长年的头晕眼花症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精神和体力。

童年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尼采后来的生活。在普福达预科学校，他攻读诗学、科学、希腊文及拉丁文等，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他那种畸形发展的身心，却成为同学们取笑的对象。他在学校里整日被眼花症困扰，稍一见光就会头晕，于是他更加懒得来到户外，大多数的时间躺在床铺上，听着音乐，长久地陶醉于梦幻般的冥想世界中，在那里他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1865年，尼采进入波恩大学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半年后放弃神学，专攻古典语言学。在初上大学的头一年，他便碰巧读了叔本华的著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这使他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并在几年之后走上了哲学之路。

尼采毕业后，25岁那年，老师李契尔推荐他担任巴塞尔大学

的古典哲学讲师。此时的尼采，在古典语言方面、尤其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已有了惊人的造诣。尼采从这一刻起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对尼采来说，相比于教书，似乎哲学对他的吸引力更大。从他接触叔本华的著作那时起，他就开始沉思某些关于人生和人类的根本问题。

在巴塞尔大学任教的第三年，即 1871 年，他开始写作《悲剧的诞生》，并于次年 1 月出版。通过这部著作，尼采感觉到了自己的哲学天赋，并且意识到自己抓住了某些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

随后几年，他一直为自己是继续教学还是从事哲学这个问题而苦恼。但他还是写出了一系列著作，如《季节的沉思》、《人性的，太人性的》等。

1876 年，尼采曾向一女子求婚，但是遭到拒绝，那个女子嫁给了一个没有一点哲学头脑的人。这对尼采的感情生活是一个致命打击，从此他终生未婚。这次恋爱的失败，也把尼采的思想引向一个极端。他开始怀疑是非善恶的道德问题，他认为是非善恶本身并没有道德的意义。

1879 年，尼采辞去了大学的教席，做了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独自游历了许多地方：日内瓦、西西里、莱比锡等，自称是个“漂泊者”。

在 1879 至 1889 年这十年，尼采强化了他的超人哲学，认为真正的神明就是人类自己。他写了一大批作品；《漂泊者及其影子》、《曙光》、《快乐的知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系谱》、《偶像的微光》、《瞧！这个人》等。在这些书中，尼采的唯意志论的超人哲学已完全成熟。

1889 年元月初，尼采摔倒在地，并出现精神分裂症，此后一蹶不振。1900 年，尼采逝世。其妹妹在他死后整理出版了他最精彩的笔记《权力意志》。

尼采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人物，他的反对者和支持者竞相误解、曲解他的学说。在尼采死后，他的思想越来越受人重视，在 20 世纪的哲学书籍中，尼采的名字闪闪发光，他的超人思想给后世极大的影响。

严 复

严复 1853 年出生于中国福建。他从小热爱读书，博闻强记。13 岁那年，严复考入了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毕业以后在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1877 又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在留学英国期间，严复接触到了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此期间，他积极研究西方社会的经济学说和英国的社会制度，最后他认识到了英国的“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完美的议会制是英国富强的重要原因。经过两年的国外学习，严复于 1879 年回国并担任了福州船政学堂的教习，第二年又担任了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94 至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严复对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十分不满。他认为，救国不仅仅是加强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必须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所以他积极地主张变法维新。

从 1895 年起，严复撰写了很多政治论文，他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文章，抨击了中国的封建制度，批判了封建主义，同时赞扬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阐述了维新变法理论和维新变法的纲领：“鼓民力”，“开民智”，“废八股”，“兴西学”；“新民德”，他呼吁禁止鸦片与缠足。创立学院，废除专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严复的这些思想对当时封闭的中国人来说如同霹雳闪电，给渴望救国图存的爱国知识分子影响很大。

与此同时，他还把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的书籍译介绍给中国人，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许多国外的一些伟大的学说著作。

《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阐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和规律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它》一书的前二篇。严复翻

译《天演论》的主要意图是想通过宣传其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这一思想震动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胡适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天演论》一出版就风行全国，也成了维新派变法的思想武器。

严复是第一个系统地把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居功至伟，也使他在我们民族史上千古留名。

晚年严复的思想日渐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他甚至一度主张复辟，这也成了他人生中令人遗憾的事件。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5月6日出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弗莱堡一个犹太羊毛商人家庭。由于生不逢时，和别的犹太家庭一样，他们家一直受到反犹太者的迫害和歧视。弗洛伊德4岁时，全家迁到维也纳。恶劣的环境，从小就使他养成了坚强不屈的品格。

由于遭受迫害，弗洛伊德没有上过小学，尽管父亲的知识有限，但却四处借书给他阅读，在父亲的培养下，弗洛伊德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段时期他比上学的孩子读的书还要多。

10岁时，环境稍有变化，弗洛伊德上了中学。在中学的几年里，弗洛伊德读书非常刻苦。他不满足教科书中所讲到的知识，总是按教科书的提示去阅读大量的参考书。他把解难题当作一种乐趣，这一爱好培养了他独立思考，敢于解决困难的精神。

弗洛伊德除了学好所有的课程外他还阅读了大量课外书籍，而且还自修希伯来文，他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整个中学时期，他年年都是班上的第一名。

弗洛伊德曾打算将来去学法律，但当时正值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风靡欧洲。他说：“达尔文当时提出的那些颇有争议的理论，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他的理论可望使人们在认识世界这一方面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于是他准备去学医。中学毕业后，他由于品学兼优被保送到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

当时巴斯德创立了细菌学，弗希纳创立了心理学，孟德尔创立了现代遗传学，这些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果，对弗洛伊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人的思想及整个人体的奥秘，吸引、推动着这位医学院学生更加去努力钻研、学习，他除了必修的专业课外，还要去听哲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等课程。据说，他在大学的几年里几乎

没荒废一天的时间，因此他还没毕业就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当上了生理学教授布目克的正式助手，并在老师指导下完成了几个难度很大的科研项目，这使他在奥地利科学界初露头角。1881年，他顺利地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第二年成为维也纳医院的临床实习医师。不久，他在布吕克教授的热心推荐下，得到了一笔留学法国的奖学金。他在法国着手研究精神病和催眠法，并得出结论：如果催眠术能导致神经错乱，那么神经错乱也许是由自我暗示所致，因为催眠术使患者对头脑中原先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产生了反应。

1886年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他结合自己的神经病医学实践，于1895年与布洛伊尔合著《癔病之研究》一书。他在共同的研究中发现，如果使病人进入轻度催眠状态并让其畅所欲言，就有可能使其恢复记忆，而这些记忆正是由于被拒之于自觉的观念之外，受到压抑并变得无意识的。

1900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梦的解析》这篇成名作。书中提出了心理图式的理论以及意识、浅意识与无意识三个领域的学说，对人类精神困境进行探讨。弗洛伊德认为梦幻和神经病症的形成大抵相仿，是“受到压抑的冲动之需求，与自我的一种潜意识压抑力进行抗争最后达成的妥协”。他认为最没意义的概念、最随意的口头语、最荒唐的梦，一定有某种意义，并可用来揭示常常不可理解的“行为”。

后来他发表了《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他认为性冲动从婴儿呱呱坠地那天起就有了。然后经历了许多不同的阶段：口腔期、肛门期、性器官期，在不同阶段，引起性欲的不同部位会产生快感。

两重性的概念一直是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主要特点，不管人们把冲突看成是自我防护与性本能之间，还是看成自恋与恋他，或是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不管用哪一种涉及本能的理论来阐述，都是无法为自我所接受的那些方面的相互冲突。这种看法后来成为了种种动态心理疗法理论，包括精神分析，集体或个人心理疗法，家庭或婚姻疗法。此外，对文学与戏剧评论，教育和儿童教养等方面，它都产生了影响。

虽然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对本能的需要与文明的局限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持悲观看法，但是，仍有不少人还是把他赞誉为一位精神的解放者。因为是他把西欧人的思想从极端的推理主义中解脱出来，并使之趋向把人格作为一整体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弗洛伊德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新方法，使我们了解到，在人的行为中迄今仍有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他的关于不可接受的无意识本能冲突这一中心思想，有助于人们对神经病症、梦幻和动作颠倒进行研究。现在人们才懂得，神经错乱的那些附带现象，原来是病人的含义丰富的心理交流而已。

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的理论扩散到欧美各国，并渗透到各个领域。一时间，全世界掀起了弗洛伊德的热潮，他成为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1938年德军占领维也纳，他被流放，次年在伦敦离开了人世，终年85岁。

弗洛伊德以《梦的解析》而闻名于世。他创立的精神分析法对人类行为进行了革命性的探索，但他的理论和成果在人们膜拜和揶揄之中，现在却仍然悬而未决——在艺术与科学之间，在心灵与肉体之间。

康有为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中国广东南海人，从小生活在封建的儒家教育环境里，聪明好学。按照书上圣人说法，中国是“天朝大国”，外国是没有文明的落后地方。可后来他读了一本介绍外国情况的书，眼界开阔了，才觉得外国并不像圣人们说的那样落后，他们有兵舰和大炮，还有一套比中国先进的治理国家的理论和方法。他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去了香港，对外国人管理社会的办法有一个初步认识。后来他又到了上海，看到了很多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书。康有为在那些书里知道，原来俄国和日本也是很贫穷的，后来实行了很多由内而外的变革，很快强盛起来。康有为想到，如果中国也像他们国家一样搞改革，不是也可以由弱变强吗？想到这里，他很高兴，好像找到一付医治中国的药方。他决心凭这个“药方”去干一番大事业。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乡试，被主考官评为第三名举人。可是到发榜的时候，他的名字却不在榜上。原来康有为曾经给光绪写过一封要求实行改良的信，他在信上说，现在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如果赶快变法，还能挽救。再拖上几年，就不可收拾了。一个顽固透顶的叫徐桐的老官僚看到了这封信很生气，他认为，像康有为这样的小人物，居然要皇上实行变法，是一种“越格犯上”的行为，这种人怎么能用呢，于是他就派人把康有为的名字划掉了。

康有为落榜以后，心情沉重地回到故乡。他决心培育一批人才，同自己一道推动中国的变法。他自建的学堂名字叫“万木草堂”，康有为把课堂当作宣传变法的讲坛。他对学生分析了中国现在的形势，外边是强敌入侵，国内灾难不断，当官的吃喝玩乐，百姓民不聊生，我们的国家正在危急存亡关头。最后总结

道，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像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实行变法。学生们听到康有为充满感情的讲解，大受感染。

1895年4月，一千三百多个举人联名给光绪皇帝上书请愿。史称“公车上书”。这次请愿的主要发起人就是康有为。“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可是康有为变法的主张从此传播到全国各地。

1897年，康有为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被帝国主义强盗强行割去不少，心中忧虑。第五次上书给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后来等到全国举人到北京考试的时候，康有为联合举人们，成立了“保国会”，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认为我们的国家到了危急时刻，祖宗之法非变不可。顽固派看到康有为组织团体鼓吹变法，非常恐慌，上书给光绪皇帝，诽谤康有为。在顽固派的高压下，“保国会”解散了。可是维新变法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了。

康有为变法的主张，慢慢地渗入到光绪皇帝的心里。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诏书，决心实行变法。几天后，他在颐和园的仁寿殿召见康有为，想当面听一听康有为的意见。他们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谈了两个小时。光绪皇帝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他让康有为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康有为的变法劲头更大了。

康有为没有想到的是，变法很快就失败了。光绪皇帝宣布变法一百零三天后，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慈禧派兵捉拿康有为，结果扑了个空。原来光绪皇帝意识到情况不妙，在慈禧政变的前四天给康有为写一封密诏，要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去。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逃亡，康有为到了香港，后来辗转到了欧洲，过着流亡生涯。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许多人认识到，清政府已经不可救药。必须推翻它，建立新的政权，这样中国才会有救。可是康有为认为皇上是圣明的。他要鞠躬尽瘁报答皇帝，不肯加入到革命党中去。后来，康有为一直表示忠于被推翻的清朝，知道溥仪被赶出皇宫，他还赶去朝见。康有为落伍了，这个曾经领导了一代革新运动的人，到了晚年又成了守旧势力的代表。1927年，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孤零零地离开了人世。

亨利·帕格森

亨利·帕格森 1859 年 10 月 18 日生于法国首都巴黎。帕格森小的时候，他的一家曾迁居英国伦敦数年，这使他小时候就学会了英语。他 9 岁时又随父母回到巴黎定居。帕格森脑袋硕大，聪明颖悟。中学时他数学成绩超过一般同学。中学毕业前夕，他在数学班应征写了一篇论文，获得数学奖金。由于他解题有特殊创见，《数学年报》破例全文刊登了这篇论文。

帕格森不仅有数学方面的天赋，在语言学方面也有高超的悟性。他听到生动的言辞就会产生一种愉快的共鸣。中学毕业后他踌躇徘徊，是学理科考高等工艺学校呢？还是学文科考高等师范学校？最后他决定学文科，于是 1878 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仍保持着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他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读实证主义哲学家斯宾塞的著作，成了斯宾塞的信徒。他相信机械唯物论。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无神论者。”有一次，他当班里的图书管理员，没有把书架上的书整理整齐。老师责怪说：“一塌糊涂，你们的图书管理员的灵魂可会安宁？”话音刚落，同学们就异口同声地喊道：“帕格森没有灵魂！”3 年之后，毕业时帕格森获得了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合格教师资格证书。

大学毕业后帕格森先后担任了几所中学的教员。同时抽机会到大学里担任临时讲师，在任中学教师期间，他曾仔细研究了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哲学著作《物性论》，研究成果发表后，对唤起青年研究古典文学的兴趣起了重大作用。在深入进行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他撰写出第一部哲学著作《意识的直接材料》（20 年后英译时书名改为《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 年他将此书提交巴黎大学应试，获文学博士学位。

1898 年，39 岁的帕格森回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讲师。

1900年柏格森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兰西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直属国家教育部，以自由讲座形式传播知识的最高学府，内设哲学、理科、文史三大部，共数十个讲座。柏格森先后任古希腊哲学讲座、现代哲学讲座主讲20年。他的讲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思想深邃、文辞美妙、论辩有力、姿态优雅，他的讲演牢牢地吸引住听众，深深地打动听众的心灵，令听众赞叹倾倒。他讲课时，常常在开讲前两三小时就有人赶来等候，听课者有教授、大学生、神职人员、政府官吏、军官、社交女人，有法国人，也有外国人。不仅课堂上座无虚席，而且门口、窗户、甬道、讲台边都挤满了人。柏格森讲演时，听众寂然无声，犹如在教堂里祈祷。讲演完毕，听众报以狂热的掌声。1921年，柏格森62岁，退休。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柏格森被选为全国最高名誉学术机关“国家学院”的“道德学与政治学学士院”学士、“国家学院”的首脑部分“法兰西学士院”学士。

柏格森分别于1900年、1904年、1911年出席了第一、二、四届国际哲学大会。

1908年柏格森到伦敦，见到了在英国讲学的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初次晤谈，柏格森的才智就令詹姆斯深为叹服。詹姆斯遂在讲课中增加了介绍柏格森哲学的内容。詹姆斯回国后，怂恿并帮助自己的朋友翻译了柏格森的著作《创造的进化论》，并打算亲自为之作序。1911年詹姆斯的重要著作《实用主义》译为法文，柏格森为其写了题为《真理与实在》的长篇序言，以悼念上一年（1910年）谢世的朋友詹姆斯。

20世纪初的头20年中柏格森多次赴英国、美国讲学。

柏格森老年患了风湿病，闭门谢客，但仍笃学覃思，著述不辍。69岁那年即1928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由法国政府官员送到柏格森寓所，其夫人出面交接。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挥军西进，势如破竹。1940年6月巴黎被攻陷。老病中的柏格森因山河破碎，心情格外沉痛、凄惨，病情陡然恶化，于1941年元月4日与世长辞。

柏格森在其 60 多年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写下了大量的哲学著作。除了早期的博士论文外，重要的还有《物质与记忆》（1896 年）、《形而上学导论》（1903 年）、《创造的进化论》（1907 年）、《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源泉》（1932 年），以及汇集平时论文、讲演稿而成的“专论与讲演”两集，一集题为《精神能力论》（1919 年），另一集题为《思想与动力》（1934 年）。通过这些著作，柏格森建立了一个以颂扬生命、倡导直觉、贬斥物质和理智为中心内容的反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的哲学中虽有合理的思想，但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与现代的科学精神、唯物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帕，1864年4月21日出生于德国爱尔福特一个经营麻纺织工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民主自由党”的普鲁士下院议员、帝国议会议员。母亲是一个正统的加尔文教信徒。老韦伯倔强、执拗，要求妻子和孩子们在家庭中绝对服从他，夫妻俩因此感情不和。

1881~1884年期间，韦伯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同时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之后，在柏林大学完成学业。韦伯早年攻读法律和经济史，20多岁时曾担任一名律师的助手和大学助教，直到1893年，1895年，他在弗赖堡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896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期间完成关于古罗马土地史和中世纪贸易行会的发展等论文，以后又为德国最重要的学会——社会政策联盟作了德国东部土地问题综合分析等论文，并参加了左翼自由基督教社会联盟活动。

韦伯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正义感的民族主义者。1895年，在弗赖堡的一次演说中，他尖锐指控德国容克贵族，讽刺他们是历史的渣滓。他对自由党持批评态度，指责自由主义已是一个衰颓的运动，并提出了“开明帝国主义”的概念。

1897年，韦伯的父亲去世，他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1898年春，他患了神经衰退症，自此连住了5次院，病愈后出外旅行，疗效也不是很大。由于情绪上的紊乱，他常常无法工作，有时，不得不一连几小时坐窗口修剪他的指甲。直到1903年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才恢复了研究工作。韦伯大器晚成，他的重大成就都是在病重到逝世这十几年间作出的。

韦伯最有名、最引起争议的一部著作是《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该书根据统计数字，说明了德国资本主义兴

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的相互关系。他并不否认在加尔文以前早已存在资本主义企业，他也了解存在发展资本主义所必备的其他物质和心理条件，但他认为，在加尔文主义出现以前，资本主义兴业精神一直受到教会中流行观念的敌视，因而不能充分发展。他认为，过去的宗教信仰从未使人们设想，财富的积累是神的永恒恩典。清教徒参与了建立现代经济生活庞大机构的行动，它必然要主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价值。除了揭示宗教思想在社会结构中的广泛影响，并且探索宗教信仰所导致的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之外，韦伯也考虑了社会组织后果问题。他因此以最早研究组织结构的学者而闻名于世。

1910年，韦伯帮助德国建立了社会学学会。他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经济史和文化史，他还对印度和中国宗教文化进行分析，并把它们与西方宗教进行对比。后来，他又发表了《经济与社会》一书。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提出了一种方法论，论述了一系列探讨宗教社会学、政党和小群体行为社会学以及历史哲学的论文。可以说，现代社会学说，多是从韦伯的著作发展而来。

由于韦伯的文章多数刊在只有专家才能阅读的学术刊物上，他的影响在他死后才显示出来。

孙中山

孙中山，字逸仙，诞生在 19 世纪晚期中国广东省的一个偏僻山村里，他是贫苦农民的子弟，“大清帝国”的“子民”，这时很难看出日后他却成为用民主思想和革命手段推翻了压在中国农民头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真龙天子的英雄人物。正是他才使中国开始尝试建立法、美式的民主制度，加速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近代化进程。

而这一切得益于他移居檀香山的种植小麦的哥哥孙眉的帮助。孙中山 12 岁时求学檀香山就读“西学”，后入香港中央书院、香港西医书院就读，虽然不是“学而优则仕”，然而只有学习西方才打开了近代东方学子智慧的大脑。这样，在他短暂地行医于澳门、广州等地后，便上书清朝重臣李鸿章主张政治改革，以求中国在列强践踏下站立起来。这次毫无结果的“上书”，使这个看来愣头愣脑的青年走上了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道路。

其实，尝试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并不是孙中山的发明，太平天国的农民们已经作过了长达 14 年的努力；所不同的是孙中山这次进行的是“文明的革命”，是有着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彻底的否定。1894 年他组织兴中会这一革命团体发动暴动时，受尽了高谈阔论的改良者们的嘲讽和清王朝的追杀。但是这一切只能使孙中山继续坚定地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并且拥有了愈来愈多的追随者和志同道合者。1905 年，游学海外的革命者们组成了革命联合体——中国同盟会，这个政党从设在日本的总部里发出一系列指示，推动了更大规模的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华南地区的一系列暴动，孙中山每每亲临其境。这些暴动最终促成了湖北武昌的士兵起义。1900 年 10 月 10 日，当武昌起义的士兵们奇迹般地一夜之间暴动成功后，

一个月各省像多米诺骨牌般出现了连锁反应，纷纷宣布独立。这样，清王朝只能指望心怀鬼胎的大臣袁世凯来“力挽危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作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在南京组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但是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种种的复杂矛盾和袁世凯奸诈的逼迫，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同时清朝皇帝宣布退位。清王朝以及中国的封建制度的统治从此划上了句号，“真龙天子”成为历史的图腾。

孙中山的伟大贡献还在于他的思想成就。作为民族民主主义者，他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时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誓词中，更是明确地提出随之归纳而成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像这样系统而凝练地把中国的命运表达得如此深刻，孙中山是空前的，同时也对毛泽东等革命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孙中山为他的“三民主义”理想奋斗终身。在建立三权分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后，孙中山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宪法》，及一些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法令；在袁世凯篡权、段祺瑞解散国会时，孙中山又发动“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当苏俄十月革命的世界大变局到来之后，他把目光着眼于劳工，寻求实现理想的新的动力；并于疾病缠身时，北上参加“非常国会”和发动废约运动，推动民族民主革命向前发展，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革命旅途之中。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历史巨变处于紧要关头的缩影，是他最终在改良不成的迫不得已的情形下挺身而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从而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他创造了一个时代，虽然在其有生之年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的一句名言至今仍有重要意义：“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是一个推翻了被马克思称作世界上最落后的堡垒——清朝封建帝国的人，他为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奋斗终生，并最终以自己的探索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年），浙江省绍兴市山阴县人。蔡元培委身教育事业是以戊戌变法的失败为契机的。1898年冬天，他回绍兴就任绍郡中西学堂的总理，就提倡新思想，后又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提倡民权，办爱国女校，倡导男女平等，办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将革命与教育相结合。1912年他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被社会公认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纲领性文件，首次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方针。1917年1月，他就任北大校长，将北大改造为焕然一新的中国最高学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中心。之后，他还试行大学区制，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撰写教育论文，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吸收欧美和日本近代教育的经验，首次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方针。新教育方针包括：军国民教育（军事、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公民道德教育（德育），世界观教育和美学教育等内容，构成了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蔡元培进行教育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了确保近代新教育思想和方针的实施，蔡元培在废除了清朝的各种带有封建主义内容的教育法规和制度以后，制定了具有近代进步意义的新教育法令和学校章程。他在教育部期间，先后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民国教育部官职令》和其他一些教育法令。内容主要有：（1）除旧布新，改革学制；（2）修订教材，废除“经科”；（3）加强普通教育，重视实业和军事体育教育；（4）提倡发展社会教育。此外，蔡元培在教育实践中还十分重视派遣留学生的意义，他认为派遣

学生留学国外，是提高我国文化和科学水平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之一。因此，他从注意提高选派留学生的质量入手，要求各级学校重视留学生的派遣工作。

提倡和重视女子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大力主张推广普及教育和女子教育，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实践上开创了近代中国男女同校的先河。1912年，他任教育总长后，立即规定：小学实行男女同校。继之，1917年他任北京孔德学校校长，首次开了中学男女同校的先例。两年之后，1919年他在北大开创了近代中国大学实行男女同学的先河，在政治界和思想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即是他的美育思想。他认为美育是养成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美育可以使受教育者通过美的感染与熏陶，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他认为美育可以给人们提供高尚的娱乐活动，从而达到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改善、净化社会风气的目的。在当时日益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及时提出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疑很有现实意义。

此外，蔡元培力求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重视发挥学生个性，这是他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主要内容。这在今天，仍给我们以无尽的启迪。

弗·伊里奇·列宁

列宁（1870～1924年），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斯基，马克思、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人。俄国共产党和苏联共和国的创始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1870年出生于俄国辛比尔斯克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列宁17岁便参加了革命运动，18岁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1894年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和建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1917年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十月革命以后又领导人民粉碎了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1919年建立第三国际，推动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列宁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到了一个新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在经济学领域他也以自己杰出的智慧为后人开启了新的途径。他于1924年在莫斯科逝世。

列宁的主要著作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中国的战争》（1900）、《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资产阶级实业财政家和政治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国家与革命》（1917）、《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纲领初稿》、《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非批判的批判》、《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等。

19世纪最后30年里，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由于新的炼钢法、发电机、内燃机车等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了汽车制造业、钢铁

工业、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许多新兴部门不断涌现，以及交通通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是不平衡的。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重工业的发展，旧工业部门的发展落后于新工业部门的发展。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衰退，一些新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高速发展。这样第二次产业革命便改变了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的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刻变化的最重要表现。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由此而得到广泛发展，促使资本和生产日益集中并造成了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并为大资本所吞并，垄断组织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政治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党的领导人背叛了第二国际，公开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经济学断章取义，割裂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内容，使马克思经济学成为书本上的“教条”和孤独的“信条”。俄国本身曾先后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斗争。这一切都促进了列宁思想上的极大发展。同时他又吸收了霍布森、希法亭、舒尔采、格弗尼茨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为其经济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全面而坚定的基础。

列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列宁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刻分析，明确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在社会上形成了统治地位，过量的商品输出变成了典型的资本输出。资本输出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因而它是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坚实基础，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全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列宁指出这种新变化一方面导致垄断价格的形成；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可能完全地、长久地排除世界上的

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出现新的科学技术，这样又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列宁对资本主义时代新变化的基本趋势分析的科学性不仅为之后帝国主义发展史所证实，而且对我们现今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基本趋势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

列宁认为过渡时期是指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那一段过渡的革命转变时期。目的是消灭剥削阶级，消除工农差别，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其经济特征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关于新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遭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疯狂武力进攻，为挫败国外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国内武装叛乱，俄国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将大、中、小企业部门收归国有，实行国有化；实行粮食贸易垄断；制定余粮收集制；实行义务劳动制；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并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借制。新经济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病。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及时领导苏维埃俄国走上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列宁及时总结论证了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并实现了这个重大转变。在《论粮食税》、《十月革命四周年》和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明确指出要根据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不能超越现实发展阶段，需要经过“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必须努力学习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从战时共产主义可先退到资本主义，允许公民自由贸易和私人商业发展，恢复小农经济。列宁把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作为苏维埃俄国新经济 with 农民经济的结合点，作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形式，从而使新经济政策理论

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理论的探讨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普遍规律性和国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依据，解决了做为经济落后国家的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方式、步骤、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1) 列宁认为制定统一的计划经济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在革命胜利后不再保留私有制，不给私有制以自由。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其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对生产力的破坏，合理地利用资源，科学地组织经济建设。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必须对国情进行科学分析，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核心，使长远规划与当前任务紧密结合。同时列宁还论述了关于国家的工业化和电力化问题，即利用现代高科技建设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问题。

(2) 随着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要从依据书本转向依据实践、依据经验的基本思路明确和坚定后，列宁就经常强调像俄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同时明确提出学习和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提出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 = 社会主义。这个著名公式从表面上看，由原来实行的单一计划经济转向把商品经济关系引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似乎是一种退却，而实际上却是一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偏差的校正和体制模式的调整。他不囿于别人和自己已经得出的认识，不断依据实践进行修正，表现出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精神。“新经济政策”所体现的还未定型的模式，可以说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趋向和接近正确历史定位而产生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雏形，虽然列宁过早逝世，还没来得及在实践中完善它，但这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可以启迪后人的宝贵遗产。

伯兰特·罗素

伯兰特·罗素（1872～1970），英国著名哲学家、散文家和数学家，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具有丰富多彩个性的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特雷克，年轻时曾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毕业后先后担任剑桥三一学院评议员、哲学讲师，因反对英国参加一战被迫辞职，以后依靠写作和演讲生活。1944年重新在三一学院任教，被选为英国科学院名誉会员，并在20世纪50年代获诺贝尔和平奖。罗素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莱布尼茨的哲学》、《数学原理》、《哲学问题》、《数理哲学导论》、《人心的分析》、《幸福之路》、《西方哲学史》、《西方的智慧》等。

《西方哲学史》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序言。在序言中，罗素主要阐述了自己写作这本哲学史的目的。他说：“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阐述历史而阐述历史，而是证明哲学是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的产物。

第二部分是绪论。在绪论中，罗素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即“何谓哲学”。罗素认为，哲学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一个学科。神学的领域是思考人们无法用确切的知识加以肯定的事物，科学的领域则是解决确切的知识，哲学则是用理性而不是用权威来思考人类无法用确切知识加以肯定的事物，所以哲学的内容接近于神学，但方法则是科学的。第二个问题即“何谓哲学史”，这个问题紧承前一个问题而来，罗素认为，既然哲学掌管的是科学与神学之间的领域，那么，哲学史就应当从公元前6

世纪的米利都学派开始，并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哲学”，从米利都学派开始到基督教的兴起和罗马的灭亡；第二个阶段是“天主教哲学”，从11世纪到14世纪，这一时期基本上是以天主教会为主的神学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7世纪至今，这一阶段的哲学思想更受科学的支配，但宗教仍然占重要地位。

第三部分是正文。正文按照绪论的描述分为“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近代哲学”三卷。“古代哲学”包括三篇，第一篇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论述了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哲学思想，例如米利都学派等；第二篇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第三篇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代哲学”，论述的是斯多葛主义和犬儒主义等思想。“天主教哲学”包括两篇，第一篇是“教父”，论述的是基督教的历史，特别论述了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第二篇“经院哲学家”，重点论述的是阿奎那的思想。“近代哲学”包括两篇，第一篇是“从文艺复兴到休谟”，第二篇是“从卢梭到现代”。

罗素一生著作非常之多，而且文笔优美，所以许多作品都受到人们的喜爱。罗素享有哲学家的名声，原因就在于他的《西方哲学史》。罗素《西方哲学史》的特点是在学术评论中融入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因此，尽管该书是一本哲学史的著作，但实际上却是罗素趁机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著作，这一点在阅读《西方哲学史》时应加以注意。

塞缪尔·P·亨廷顿

塞缪尔·P·亨廷顿（1876～1947），美国当代政治学家，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学家。出生于纽约，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和政府学系主任。曾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担任公职或充当顾问。其政治学方面的主要作品有：《政治力量：美国和苏联》、《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共同防务：国家政治中的战略计划》等。

本书共分为政治制度化、政治现代化、当今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普力夺社会、革命和改革以及现代政党体系与政治发展等几部分。

亨廷顿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差距不在于其政府统治形式，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美国和苏联一般可以归入有效能的国家，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亚、非、拉国家的政府则不同，这些国家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原因就是在这些国家中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参与政治，而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步伐太慢。他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众参与政治的愿望提高，必须相应地提高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政治制度具有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如果没有有效的政治制度，社会就缺少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

接着，亨廷顿谈到了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他说，20世纪许多亚、非、拉国家之所以发生政治动乱，其原因是现代化而不是落后。现代化导致了腐败，这是国家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的一种表现。另外，现代化带来了城乡差距的拉大。亨廷顿认为，所有这

些现代化带来的后果，都需要有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的存在，因为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缓解现代化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众政治参与压力，才能确保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

作者认为当今现代化国家面临着很多问题。与美国当年所不同的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巨大社会障碍只有依靠强大的集权政府才能解决。传统国家进行现代化需要改变社会经济、文化信仰和行为方式等传统的东西，这就需要权力的集中；另一方面，现代化造就的、新的社会集团渴望参与政治，需要权力的分散。这样一来，传统国家推进现代化就必然会陷入困境。这个问题涉及如何处理传统权威与现代权威的关系。作者的办法是使传统的权威统而不治，而使人民通过选举组成的政党和立法机关所表达的意愿成为权威。

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最有可能发生革命的情况有两种：政治制度没有为新兴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提供渠道；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新兴社会力量具有强烈的参与政治的愿望。改革是指在政治制度方面发生范围有限而又缓慢的变化。改革者必须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之间取得平衡。

在关于现代政党体系与政治发展部分中，作者阐明了自己对政党制度的态度。他认为，现代化社会的最终政治体制是英美的两党制。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而政党是否强大又取决于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就政治发展而言，政党制度的数量不是最重要的，它的适应性和力量才是最重要的。两党制能成功地使政治两极化成为制度，维持一种更加公平的均势。历史证明，两党制在动员农村时比大多数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更加成功。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是亨廷顿理论的奠基之作，在书中，作者主要运用了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发展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

历程。认为这些国家应该学习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走出本国的困境。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当代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变革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本书初版于1968年，几十年后的今天它仍然被当作研究现代化理论问题的经典之作，是美国乃至西方研究现代政治理论的学者的必读书目。亨廷顿坚持从第三世界国家的具体国情出发看问题，较之以往的理论在现实主义上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然而该书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立足点，在根本问题的论述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一条真正的走出困境之路。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出生在德国西南的乌尔姆城，一年后随全家迁居慕尼黑。他父母都是犹太人。爱因斯坦小时候并不活泼，3岁多还不会讲话，9岁时讲话还不很通畅，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过吃力但认真的思考，这使得他的父母甚至担心他可能是智力迟钝的儿童。据说在1894年爱因斯坦还被慕尼黑中学斥退，学校认为他“调皮捣蛋”。他对德国事物的仇恨加深，不愿再作一位德国公民。他说服他的父亲，为他申请放弃公民资格，这个要求1896年得到当局批准。他事实上没有国籍，直到1901年他才获得瑞士公民资格。

爱因斯坦在瑞士阿劳受完中学教育后，于1896年在第二次尝试中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毕业后爱因斯坦因没有得到一个学术职位，只好以做家庭教师为业，直到1902年他才在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得到一个第三等技术员的职务。他在这里继续思考和研究物理学上的问题。1905年，他在《物理学年鉴》杂志上发表了4篇论文，都是指导20世纪物理学前进的著作。

1905年，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光电效应和布朗运动三个不同领域里取得了重大成果，表现出惊人的才智。但是，当时科学界对此作出响应的人寥寥无几，法国著名科学家朗之万曾对爱因斯坦说，全世界只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相对论。大多数人是怀疑的，有的甚至坚决反对。这是因为伽利略和牛顿创立的古典力学理论体系，经历了200年的发展后取得了辉煌成就。尽管旧的理论体系和新的事实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但许多物理学家仍不能摆脱它的束缚。他们力图把新的实验事实和物理现象容纳在旧的理论框架中，但爱因斯坦却不迷信前人，他探索着把相对论

推广到更为广泛的运动情况中去。为此他又研究了整整 10 年。1916 年，爱因斯坦发表了总结性论著《广义相对论原理》。

19 世纪末，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和牛顿力学趋于完善，一些物理学家认为“物理学的发展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当人们运用伽利略变换解释光的传播等问题时，发现一系列尖锐矛盾，对经典时空观产生了疑问。爱因斯坦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物理学中新的时空观，建立了可与光速相比拟的高速运动物体的规律，创立了狭义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是：（1）在一切惯性系中，基本物理定律都是相同的，称为狭义相对性原理。（2）在任何惯性系中，真空中的光速都相同，恒定地等于 c ，且与光源的运动无关，称为光速不变原理。由此得出时间和空间各量从一个惯性系变换到另一惯性系时，应满足洛仑兹变换，而不是伽利略变换，并导出许多重要结论，主要有：量度物体长度时，运动物体沿运动方向的长度比静止时缩短，即尺缩效应；量度物体的时间历程时，运动物体的时间进程比静止时长，运动的钟比静止的钟走得慢，即钟慢效应；物体的质量随运动速度的增大而变大；质量为 m 的物体具有的总能量为 $E = mc^2$ （质能关系式）；任何物体的速度不可能超过光速 c 等，这些结论与大量的高速（接近光速）运动的粒子的经验事实相符合，特别是在原子核能释放中，质能关系式被具体化，使人类进入原子能时代，为电磁场、核力场和弱力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上述理论从相对性原理出发，而且只对惯性系有效，称为狭义相对论。

相对论使人类的时空观发生革命性变化，摒弃了牛顿提出的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无关的所谓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观念，发现时间、空间、物质及其运动的紧密联系，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典型事实。

在狭义相对论基础上，爱因斯坦根据同一物体的惯性质量（由牛顿第二定律决定的质量）和引力质量（由万有引力定律决定的质量）总相等的实验事实，运用“思想实验”得出重要结论：在局部空间里，加速系统中的观察者看到的所有物理现象等

同于在引力场中静止观察者看到的现象。如一个升降机在没有引力的空间上升，加速度与地球重力加速度相同，机内观察者观察到自由释放的物体下落的规律与站在地面上的人观察自由落体运动所得的规律完全一样。这时机内的人可以认为物体下落是受一个力（惯性力）作用的结果。爱因斯坦引入等效原理，即在一个小体积范围内万有引力和某一加速系中的惯性力互相等效，同时把狭义相对论原理推广为广义相对性原理，即物理学的基本规律乃至对于任何参考系都相同的自然规律，具有相同的数学形式。以这两个原理为基础建立的理论，适用于一切参考系，称为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得出的一系列重要结论，认为时间空间将因物质的存在和分布变得不均匀，即发生“时空弯曲”，揭示物质与其存在形式的紧密联系，空间并不是欧几里德的“平直空间”或牛顿的“绝对空间”；并认为这种“时空弯曲”是产生万有引力的原因，据此建立了引力场论；认为狭义相对论是广义相对论在没有万有引力场时的特殊情况。广义相对论对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现代理论天体物理学基础。广义相对论作出三个重要实验预言：光线在引力场中将弯曲，水星近日点的移动和光在引力场中光谱线会发生红移。

爱因斯坦建立广义相对论时认为：宇宙中不仅充满运动着的物质——电磁场，同时存在另一种运动着的物质——引力场。运动的带电粒子产生在空间传播的变化的电磁场，形成电磁波；运动的物体产生在空间传播的变化的引力场，形成引力波。一切具有质量的物质都应相互吸引，而不管该质量的起源如何。光既然具有质量，也应和其他物质通过引力场的传递相互吸引，得出引力场和电磁场的存在导致“时空弯曲”结论，物质集中的地方是引力场“浓密”的地方，也是时空弯曲最大的地方，这种时空弯曲产生质量的吸引效应——万有引力。

爱因斯坦在建立电磁场和引力场统一理论——统一场论（爱因斯坦认为，电力、磁力与重力是一个东西的三种表现，如同水、冰和水蒸气都是由 H_2O 组成一样。统一场就是要把电力、磁

力与重力联系在一起，而成为宇宙中的一个基本的宇宙力场，也就是统一场。反过来说，统一场是由电力、磁力和重力这三个基本力互相演变与斥合来决定宇宙的性质。宇宙中充满许多重力波和磁力线，只要你知道怎样去利用，它就可以为你服务。）中进一步认为，场和实物没有本质区别，实物所在地就是场聚集的地方，“抛出去的石子就是变化着的场（引力波），在变化着的场中场强最大的态以石子的速度穿过空间。”连续的“场是惟一的实在”。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计算方法，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如果以每秒 26 万公里的速度移动，其相对位置的钟表就会以二倍的速度运转。在移动的速度上，不仅时间，就是物体的大小和质量也会发生变化。假如在这种超高速下，把头部向前倾并继续前进，身长可能会比平常缩短一半（有个人为证明这点，尝试用尺测量了一下，结果无法测量出来，因为尺子也受到同样作用的影响）。

总之，没有绝对的时间、空间，也没有绝对的运动；一切可观察的原理都是相对的。

可是，除了说明水星轨道的特殊性以外，几乎无法推测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而要抓住以光速运动的物理动态来印证这个理论的机会，几乎等于零。所以，爱因斯坦起初也不敢相信，后来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了光线接近太阳时所产生的折射状态，才敢确定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然而，大多数科学家对此推论不置可否。

1919 年出现的日蚀现象，提供了证实的良机。通常日蚀时，赤道地带都是日全蚀。英国皇家学会派了两支观测队到赤道地区，一队到巴西，另一队到几内亚湾。最终验证了爱因斯坦理论的正确。

量子物理与相对论同为近代物理两大支柱，不过前者为集体创作，后者却几乎是爱因斯坦一人的心血。单凭这一点，若要挑选本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物理大师，爱因斯坦就当之无愧。

爱因斯坦在科学思想上的贡献，在历史上也许只有牛顿和达尔文可以媲美。相对论原理的建立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过程中的

一次飞跃。相对论圆满地把传统物理学包括在自身的理论体系之中。广义相对论开阔了人类的视野，使科学研究的范围从无限小的微观世界直至无限大的宏观世界。今天，相对论已成为原子能科学、宇宙航行和天文学的理论基础，被广泛运用于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之中。爱因斯坦的伟大成就——相对论，是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约翰·梅·凯恩斯

约翰·梅·凯恩斯，（1883～1946年）出身于剑桥城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剑桥大学的研究员，曾著有《形式逻辑》、《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等书。他的母亲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女子学院，曾担任过剑桥市的参议员和市长，事业有成。小时的凯恩斯瘦小娇弱，聪慧活泼。1897年获伊顿公学的奖学金。他在这所贵族式的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多次获学校的数学奖金，文学和历史也为他所喜好，发表了不少文章。1902年他考进剑桥大学的皇家学院时已富才名，曾担任学生会的主席。这一时期，他对政治显示出浓厚的兴趣，是个能言善辩、尖锐泼辣的演说家。参加数学优等生考试的成绩竟不理想，他终于选择了仕途之路。

在第四个学年，为了应付文官的考试，凯恩斯开始正式学习经济学。他听了一个学年的经济学界的大师马歇尔开设的专题讲座。1906年的文官考试，凯恩斯高中第二，实在为他及家人所料不及。在应考的各门科目中，经济学竟得分最低。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学知识差，而是因为他从未全面系统地学习这门课程，不能或不愿按照通常的标准答案回答问题。财政部只有一名空缺，且为第一名夺走，凯恩斯只好到印度事务部任职。在印度部工作虽不足两年，却使他获得了有关政府机构活动的丰富知识，特别是学会了从行政官员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为他以后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为了获得研究员的资格，1908年7月，凯恩斯回到剑桥大学做经济学讲师。第二年他的研究员论文获得通过（1921年这篇论文以《概率论》的名义出版）。1909年，他的第一篇经济著述《指数编制方法》获亚当·斯密奖，他作为经济学者初露头角。

由于马歇尔大师的推荐，1911年凯恩斯担任了《经济学杂志》的主编（1937年患病后仍负责重要文章的编审工作）。他仍对印度问题怀有兴趣，先后撰写了《论印度最近的经济的发展》和《印度的通货及财政》等论文。此时印度的经济问题日益严重，新近成立的皇家印度通货及财政委员会聘请凯恩斯担任委员。凯恩斯提出在印度设立国家银行的建议，以便加强对印度的控制，此种主张受到马歇尔的高度评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凯恩斯匆匆到财政部应召，对战时财政提供咨询，并发表了两篇论战时金融的文章。1915年1月，他正式到财政部任职，负责有关国际金融的业务。他草拟了协约国战时公债体制、战债使用管理办法、协约国贷款与英国国内经济及物资供应协调办法等文件。他的目标是将有限的资源在协约国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而不是制定各协约国互相承担义务的规章。在战后他仍然坚持这种主张。

1919年，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大臣的代表参加了战胜国分赃的巴黎和会。但是，在德国的赔偿问题上，他与和会发生了根本分歧。他反对对德国制定苛刻的赔偿条款，斗争无效，愤而辞职。回国后，他在剑桥大学开办了一个讲座：论和约的经济意义。这门课吸引了不少学生，教室被挤得满满的。当年年底，他将讲义整理成《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正式出版。此书立刻引起轰动，尽管有人严厉抨击，却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成为英法“绥靖政策”的理论基础，也为希特勒一再引申发挥。凯恩斯终于一举成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从顶峰跌落的转折点。英国虽然在战场上获胜，却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经济上开始一蹶不振。在两次大战间的大约20年的时间里，除两、三个年头有过短暂繁荣外，经济长期萧条，投资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仍然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自动调节”的传统信条，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凯恩斯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理论的缺陷，试图寻找解决危机的新思路。

在这段时期，凯恩斯已很少讲课，集中精力研究了英国当时

的经济问题。他创建的以本科生为主要成员的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一个活跃的论坛，闻名遐迩。他常常参加学会的活动，与学生一起讨论理论与现实问题。他先后出版了《货币改革论》、《货币政策论》和《货币论》等系列论著，分析了就业、物价、储蓄与投资等问题，逐渐地形成了由国家控制经济的主张。他反对政府恢复金本位制，主张用管理通货的办法来稳定物价和生产的水平，抑制经济的波动；认为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平衡是确保整个经济稳定的前提。1926年发表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明确地提出自由资本主义已道路不通了。

1929年，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并很快席卷了整个世界。此时，凯恩斯奉召参加了麦克米伦财政与工业委员会，后又任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从实践中，他深深地感到，不以国家调节取代自由放任，就无法消除失业与经济危机。1936年他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发表。对危机作出了新的解释，从理论上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法。

凯恩斯认为，由社会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组成的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生产）水平，导致了失业与危机，因而国家必须出来调节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更加为政府重视，受聘担任了财政大臣的顾问，为政府出谋划策，还兼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战争期间，他多次出使美国，商谈战争贷款等重要问题。

1942年，为了表彰他对国家的贡献，皇室册封他为“苏塞克斯郡的梯尔顿勋爵”爵位。他得到了英国对文官的最高奖赏。

凯恩斯是个被称为“亦学、亦仕、亦商”的全才，除了在学业、仕途卓有成就外，他也极具经商的才能。他在1919年担任皇家学院的副会计长，以后又担任了正会计长，几乎是破天荒地第一次使学院的资金财源充足。在二三十年代，他一直担任国民互助保险公司的董事长，还一度担任了独立投资公司和地方保险公司的董事，以擅长投机活动著称，也为自己积累了不小的一笔财富。他的妻子是一位芭蕾舞演员，1936年，他出资为妻子建立

了一所艺术剧院。

1944年7月，凯恩斯率队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他力主建立国际性的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45年建立），并当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战后，凯恩斯又抱病多次赴美，协商贷款问题。这些繁琐与争执颇多的会谈终于使他不堪重负，溘然长逝。

凯恩斯虽辞世而去，历史却进入了“凯恩斯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凯恩斯学说为国策，推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位居“主流”地位，他开创的宏观经济学已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虽然到了七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日益暴露，但“凯恩斯革命”给经济学及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影响却无法抹煞。

马丁·海德格尔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年）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位有独创性的、影响广泛的思想家。在20世纪上半期，他的名字几乎就是哲学的代名词。

海德格尔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表现出了在哲学上的早熟和天赋。在18岁的一天，海德格尔从一个乡村牧师手中借到了一本题为《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的书，立刻迷上了它。由此，便产生了20世纪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思想。这个让年轻的海德格尔如此着迷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困扰了不知多少位哲学家，但海德格尔希望自己能给它一个解答。

1909年，海德格尔来到了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他马上发现神学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学问，而哲学对他却有无比强烈的吸引力。当时，胡塞尔的现象学正在学术界兴起，海德格尔马上对它产生了很浓的兴趣。胡塞尔的两卷本哲学巨著《逻辑研究》也成了他反复阅读的案头必备书。不久，海德格尔决定放弃神学学习，转攻哲学。

在以后的日子里，海德格尔大量阅读了尼采、克尔凯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谢林、黑格尔、狄尔泰等哲学家的著作；广泛地了解了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在此过程中，海德格尔受到了李凯尔特、舍勒等人的影响，并完全接受了胡塞尔的现象学。1913年，海德格尔获得了弗莱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做了母校的讲师。

1916年4月，享有盛名的现象学哲学创始人胡塞尔来到弗莱堡大学担任哲学讲座教授。这使海德格尔得以有和胡塞尔直接交流的机会，这对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相互的学术交流中，他们两人都得到了思想的发展，以至于胡塞尔说出了“现象学，这就是海德格尔和我”的话。

1925年冬，马堡大学提名海德格尔担任该校的教授，但教育部没有批准，理由是他没有正式的著作出版。于是，海德格尔便将他存在的多年思考所得，选其中成熟的部分写了出来，整理发表了。这就是使海德格尔一举成名的、20世纪划时代的哲学巨著——《存在与时间》。在这本书中，海德格尔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和存在与时间的关系问题。这本书在出版时有40多万字，但只是原写作计划的1/3。由于种种原因，后面的部分没有续补。但海德格尔宣称他后来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已基本展现了他哲学思想的全貌。由于这本书，海德格尔被视为现象学学派的发展者、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随着《存在与时间》的发表，海德格尔声名大振。在胡塞尔的力荐下，1928年，海德格尔接替了老师，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在这段时间，海德格尔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讲演，对存在与时间的问题进行诠释和展开。正在此时，海德格尔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大事。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取得了政权。而差不多就在同时，风华正茂的海德格尔当选为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和许多正直科学家不同的是，海德格尔采取了和纳粹政权合作的态度，并在公开场合为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鼓吹。这直接导致了文章开头一幕的发生。

海德格尔的这些行为，虽然与他的种族主义情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也同他的哲学思想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因为他的哲学思想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便是宣称存在与时间的密不可分，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无法剔除的时间维度。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它意味着人的戏剧性不只是出现在历史中，它本身就是历史。“历史性”是海德格尔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人生在世的固有历史特征。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种纯粹的生存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就变得彼此远离，或者说变成了一种无足轻重的“理论哲学”。但这种结论却非常适合于海德格尔的哲

学思想，因为在他的哲学中，克服“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两者在传统哲学上的划分，已转化为一个有计划的理论目标。所以，海德格尔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在慎重地面对世界时，“此在”就已经是哲学性的了，而“思”本身也已是实践性的了。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海德格尔 1933 年校长就职演说开始，他的哲学本身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哲学不再是一种原来的“第一哲学”，而是变成一种真正的世界观。至此以后，人们就越发难以为海德格尔那种假定的纯粹性或“哲学自足”加以辩护，相反，这些思想却逐渐与某些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的考虑融合起来了。

众所周知，哲学和生活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直接性的，而是必须借助于某些中介性因素。在海德格尔这一个案中，它的中介性因素便是由他的“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那种纳粹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为他对这个世界的政治形势的理解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托。在他的“西方——日耳曼历史此在”的单一性理论中，海德格尔的哲学信念是，只有日耳曼人“此在的复兴”，才能把西方从持续的虚无主义没落中挽救出来。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一信念不仅很快灰飞烟灭，而且还给全人类的存在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受到审查后的海德格尔一度被禁止在大学授课。1959 年退休，隐居在家乡黑森林的山间别墅，潜心著述，偶尔在朋友圈子内探讨哲学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颗哲学巨星陨落了。这位一生孜孜寻求存在意义的哲人，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路德维奇·维特根斯坦

路德维奇·维特根斯坦（1889～1951年），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具有独特的个性和迷人的人格力量。他在不同时期创建了两种有高度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每种体系均以其精致、有力的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哲学。生前发表的著作只有《逻辑哲学论》，死后许多遗著被出版，如著名的《哲学研究》，此外还有《关于数理基础的意见》、《蓝皮书和褐皮书》、《1914～1916年的笔记本》、《哲学规范》、《关于颜色的意见》等。其中，《哲学研究》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全书分上下两卷，在书中论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语言游戏的问题。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和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称作“语言游戏”，他认为，人们正是通过语言的游戏来学习语言和与外界互动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第二个是关于意义即用法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的多样性首先表现为词的多样性，还表现为语句的多样性。语句的意义就在于使用。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在这里有它特殊的含义。对于一个语句来说，只有人们知道这个语句的所指，这个语句才会有表达的意义，否则就不可能具有意义。换句话说，如果人们要下棋，只有知道棋的规则后，才会明白棋的意义是什么，否则，棋只可能是一个无意义的摆设而已。

语言游戏表明人类的语言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形式。人的生活是不能没有语言的。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语言具有不同的功能。要了解语言，不能只看它描述了什么，还应该看它是如何描述的，看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被描述的。没有意图和对象的

语言是不存在的。

第三个是关于遵守规则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必须遵守规则。规则是一种指导，它能够帮助人们如何完成一个游戏。规则是有自己的一些特征符号的，一个人不可能自己遵守一个规则。规则是一种更集体的东西，换句话说，规则是一种习俗或者说是一种体制。

第四个是关于私人语言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私人语言是不存在的。维特根斯坦举例说，谈到痛的时候，如果人们认为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是否痛苦，这种想法很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当人们使用“知道”这个词汇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在使用一个别人也明白的词汇，也就是说，别人知道这个“知道”是什么含义，因此，别人知道你所说的“痛”是怎么回事，所以，不可能存在私人的语言。但是私人语言和语言的私下使用或者说秘密语言是不同的，因为语言的私下使用或者秘密使用在某种范围中仍然是公共语言，因为这些语言在特定的对象那里仍然是具有沟通性的。

第五个是关于哲学的治疗问题。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哲学家，因此，他花大量篇幅讨论语言，最终目的是为了了解决哲学的问题。他认为，哲学是一种形而上的活动；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只是一种描述语言使用的活动。维特根斯坦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什么哲学的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哲学家对于语言的用法产生了误解或混乱的时候产生的。因此，哲学问题的出现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精神混乱的产物。因此，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就是治疗，就是让哲学不干预正常语言的使用。哲学问题形形色色，因此，最好的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就是让哲学家停止研究哲学问题。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集中反映。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哲学体系。其突出特点是较注重于揭示概念怎样同行为和反应相联系，怎样同人们生活当中对概念的表达相联系。他试图根据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根据模糊的精神领域来展示概念的作用和意义。该书从全新的角度来处理语言的问

题，并把语言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解决哲学的问题。书中有关语言的重要观点对于后世分析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在维特根斯坦之后，哲学出现了两个流派，一是逻辑分析学派，一是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前者分析的是科学哲学，后者分析的是日常的语言。但是，两者的思想都溯源于维特根斯坦，溯源于《哲学研究》，因此，《哲学研究》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体现。根据学界的研究，人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体系明显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以《逻辑哲学论》为代名的早期分析哲学和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后者体现了现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

让·保罗·萨特

让—保罗·萨特，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以他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曾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并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萨特 1905 年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海军下级军官，后来染上重病，在萨特 2 岁时就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不得不带着萨特回到自己的娘家。3 岁时，萨特因患角膜炎引起右眼斜视，几乎失明，留下终身残疾，因此萨特小时候很孤僻。

后来母亲改嫁，萨特随外祖父生活。萨特的的外祖父学识渊博，在语言学方面颇有见地，他工作勤奋，给萨特以很深的影响。

在外祖父的教育下，萨特 4 岁起就已尝试着读书了。到 7 岁时，他已读了莫泊桑、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和雨果等作家的作品，并在外祖父的影响下试着改写寓言、短诗，模仿报纸杂志和电影编写一些小说和故事，获得了家人的称赞。

1924 年，萨特以前七名的好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这是一所著名的学校，诞生了许多位著名的思想家。在萨特的同学中，有保尔、尼赞、雷蒙·阿隆、格洛·庞蒂等后来法国思想界的著名人物。在校期间，萨特广泛阅读。他比较喜欢笛卡儿、斯宾诺塞、卢梭和司汤达的著作，也接触了马克思的思想，并且坚定了献身哲学的信念。

在学校的最后一年，萨特结识了西蒙娜·德·波伏娃。他们一见钟情，在其后 50 年的漫长人生历程中，几乎没有分离过。他们彼此成为对方生活、思想历程中的伴侣和见证人。毕业会考中，萨特得了第一，波伏娃得了第二。

1933年萨特来到德国，就读于当时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门下，专攻存在与现象的性质和感觉的奥秘。1938年，萨特发表了其著名日记体长篇小说《恶心》，引起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9年萨特接到应征令，参加了军队，并在第二年的生日那天被德军俘获。在战俘营中，萨特重温了久违的集体生活，思想上获得一些变化。在1941年5月底，萨特假称自己是文职人员，又因为视力欠佳，被德国人误释。战争使萨特与社会更贴近，他懂得自己必须承担义务。获释回到巴黎后，他与波伏娃组织了一个知识分子团体，鼓动人民起来抵抗法西斯。他最有力的抵抗形式是拿起笔来写作。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许多作品，主要有《苍蝇》、《存在与虚无》等。

《存在与虚无》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它标志着萨特独立的哲学体系的形成。在这部著作中，萨特反驳了投降分子对敌投降、与敌合作的主张，他的理论观点对被占领下的人们起来反抗侵略者，起到了鼓舞作用。

战后，萨特的哲学因适合在战时受到摧残的年轻一代而风行一时，大量的追随者涌入巴黎，与萨特聚会在咖啡厅进行热烈讨论。

战后的萨特彻底改变了对政治不介入的态度，转而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他与几个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积极宣传苏联和美国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以大量精力做着推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工作。他公开谴责美苏霸权主义的侵略行为，反对法国对第三世界的殖民政策；他积极调解中东矛盾，设法改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他访问过世界上大大小小一系列国家，一直为支持民主，反对暴政、专制和侵略而斗争。

70岁时萨特左眼出血（右眼幼年时就几乎失明），加上身体多病，他不得不减少公开露面。1980年，萨特在普鲁塞斯医院逝世。

萨特一生作为哲学家，代表了存在主义；作为文学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为世界正义和平战斗到了最后一息。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年），前苏联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7岁就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在乌克兰农村帕夫雷什中学校长的职位上工作了23年，直到去世。数十年中，他以该中学为实验基地，同时广泛研究其他学校的经验，对教育问题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做出了许多理论创新。苏霍姆林斯基一生共撰写了41部专著、600余篇论文和1000多篇儿童读物。主要教育著作有《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学生的精神世界》、《把心灵献给儿童》、《和青年校长谈话》等。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就教师如何对学生进行智育教育问题提出建议；下篇主要讨论如何协调六种教育力量以保证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的双重使命是促进科技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智育体系。这种智育体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充分反映时代对人全面发展的要求，培养丰富、全面和文明的公民；二是把德育纳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完整的教育体系中。作者提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学生的智力。他认为智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展智力，完善的教学就是发展智力的教学，教学是智育的重要手段。知识与智力是相辅相成的，知识保证智力发展达到最佳水平，智力发展的最佳水平促进新知识掌握能力的增强。培养和发展智力需要多姿多彩的智力生活，课堂教学是培养和发展学生智力的重要途径，但不是惟一的途径。保证多姿多彩的智力生活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必须有让学生自由支配并学会利用自由活动的自由时间，引导学生们在自由时间里发展最喜爱的课外读物、最喜爱的学科、

最喜爱的劳动创造项目等三项爱好；二是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为集体的智力生活做出贡献。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智育的发展依赖于兴趣、观察、阅读和思维积极性的激发。要发展学生的智力，教师就必须首先激发学生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学生对知识的兴趣源泉是对知识的运用和自己亲自参加的、有创造性的劳动；观察是一种积极的智力活动，是发展智力的重要途径，是智能的极重要的源泉。从观察中不仅可以获取知识，而且知识可以在观察过程中活跃起来；阅读是整个智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学生的智力发展取决于是否会很好地阅读；思维也是作者强调的重点，他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在教学过程中要做到靠已有的知识获得新的知识；教师要成为学生思考的脑力指导者；教师要教会学生在记忆的过程中进行理解；课堂上要给学生理解、思维的时间等。苏霍姆林斯基还很重视个别施教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的使用，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特点和能力因材施教，对待不同的学生，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甚至是教学态度上都应该有所不同。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和运用也是作者强调的一个方面，他将九种重要的基本技能分为三类：一是读写算；二是观察、思考和语言表达；三是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和自学能力。

该书的下篇中阐述的主要是影响教育的六种合力。作者认为有许多力量对教育产生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六种是家庭、教师、集体、学生本人、书籍、小伙伴等。①教师对教育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胜任这一角色必须具备一系列的优秀个人品质；教师应该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研究，完善和提高个人的修养和能力。②家庭在儿童的情感教育以及智力的影响力方面作用很大，教师应该在这些方面对家长有所指导。③集体是实施教育的重要工具，集体具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智力、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组织，但集体并不排斥个体的个性，个性也是集体存在的特性之一。④自我教育最大的促进因素是自尊感，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保护学生的自尊感。⑤书籍是生活的指路明灯，它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作者建议学生自己要读书，教师

也要读书，并通过书籍来对学生施加影响。⑥学生在校外结交小伙伴，可能是积极性的，也可能是消极性的，教师在此过程中要积极加以引导。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是苏霍姆林斯基最重要的教育学著作之一，它是作者30余年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研究的结晶。由于对苏联教育体制以及教育工作者中存在的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作者在一种“沉思、焦虑与担忧、不安”的心情中将自己的思考写成这部著作。作者在书中采取建议的形式，恳切地与教师进行谈心，内容涉及教学以及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教学、教育工作的组织、内容、形式与方法，还涉及学生的自我教育、共产主义理想的形成、公民义务感的培养等问题。该书的出版在苏联引起了一次大的教育改革和讨论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探索成果的一部分，作者所提出的建议与主张对我国教育工作者具有特殊的意义。书中针对许多问题的建议，在现在看来，仍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意义。

丹尼尔·贝尔

丹尼尔·贝尔，美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职务。曾参与创办美国社会科学界名闻遐迩的刊物《公共利益》，并在美国知识精英普测中被评为当代美国影响力最大的著名学者。贝尔在战后西方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等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他的思想深受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组合型的思想结构。主要学术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今日资本主义》和《蜿蜒之路》等。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首先阐述的是他的“图画人文化观”。“图画人”就是说人是制造象征符号的动物。人类的相互交往是以有意义的象征为基础的，人类创造象征符号的过程类似于画家画出图画的过程。贝尔认为，所谓文化就是来自人类所有个体在任何历史时期都遇到的生存情景，它的主要功能是给人类世界提供一种合理化的道德，提供使人类愿意生存下来的目的和意义感，提供将人们进行整合的道德纽带。为了借助于一套象征符号所联系的凝聚力，文化必须超越现在，这就是宗教。所谓宗教就是对人的超越性的意识，是寻求一种生存的“一般秩序”。贝尔指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永远构成了道德的一部分，并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不会随时空的变化而消亡。宗教和意识形态都不过是给人类提供某种道德意义，这些传统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是随时间可以复兴的。作者认为，文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大动力，甚至超过了技术本身。贝尔将整个社会划分为社会结构、政治和文化三个领

域，在这三个领域中，存在着各个不同的社会变迁节奏，彼此之间没有简单的决定关系。由于资本主义各个领域的变迁节奏的不同，从而各领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一致和脱节，这种脱节最终导致了各领域之间和内部种种的文化矛盾。

所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包括着两个层次的社会矛盾。从表层上讲，就是社会各领域之间的矛盾。首先是现代文化的中轴原则与资本主义经济中轴原则存在矛盾；其次是社会结构的中轴原则和政治中轴原则存在矛盾。从深层次上讲，现代文化的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文化原本是提供一种生存的意义感，可现代主义文化却破除了所有的界限，破除了所有的神圣化。文化本来应该抑制的东西，如反传统、反道德秩序以及自我满足和自我表现，都成了合法化的根据。文化矛盾还出现在社会结构的内部。这种矛盾不仅突出了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脱节，而且还使社会结构内部的显著矛盾明显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造成了人们性格结构内部的矛盾。

贝尔接受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关系的理论，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清教徒及其伦理道德体系日渐瓦解。在物质享乐主义代替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教伦理，心理快乐主义取代清教徒风尚的同时，却没有一种新的宗教或价值体系以代替旧的宗教和价值体系，结果资本主义失去了宗教价值上传统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是建立在新教关于工作的道德报酬体系之上的。资本主义丧失了其合理性的基础，其症状就是缺乏共享的道德目标、团结感和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进行奋斗的热情。新教伦理和清教徒精神的瓦解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和技术秩序领域的变化，另一个直接因素就是现代主义文化。

贝尔最后强调的是文化的宗教功能。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阶层首先产生了一种虚无主义感。现代主义者对生命的审美合理化就是一种替代传统宗教而兴起的给人类生存提供意义的尝试。现代文化取得宗教功能的过程被称为“伟大的世俗化”，这种思潮的产生包括三种变化：经济政治领域中激进的个人主义；文化领域的自我观念；关于限制的观念，其意义从

宗教转移到艺术领域；天堂和地狱信仰的衰落。现代文化取代宗教的重大结果之一，就是本能冲动和理性规范，自由和约束之间传统张力的消失。人类必须永远对生存苦境做出回应，如果将宗教界定为寻找生存意义的努力，这一过程将与人类共始终。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是确立贝尔在学术界地位的著作，该书中所涉及的学科跨越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宗教学等领域。贝尔对该书的写作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化本质深刻理解基础上的，结合自己的体验与思考，他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分为深层矛盾与表层矛盾，从而凸显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整体形貌。贝尔的理论和方法论，成了推进当今世界的实实在在的科学工具。我们还要注意的，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理论在本书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作者承认韦伯的这种理论，并认为新教伦理与清教徒精神的瓦解正是带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文化原因。所以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若能结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来读将会是大有裨益的。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把社会发展分为互有联系的三个不同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按照贝尔的观点：前工业社会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所以贝尔将其称之为“对自然的博弈”。工业社会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前工业社会主要利用原料技术相比，该社会主要利用能源技术来生产社会财富，强调资本重要性。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知识正在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在论述后工业社会与其他社会发展阶段的区别时，贝尔用社会结构的五个变化来说明后工业社会的特征：

第一，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来看，后工业社会发生了从产品经济向服务性经济的转变。

第二，从劳动者的职业分布上看，专业性与技术性阶层处于主导地位。在后工业社会中，具有支配作用（并非指从业人员最多的职业）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职业，而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取代以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统治集团。

第三，从技术的利用上看，前工业社会的主要技术是农耕和渔业等开发原料的技术，工业社会主要是利用能源的生产技术，而后工业社会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

第四，从社会发展的轴心上看，理论知识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轴心。这是后工业社会最突出的特征。

第五，在未来的决策方面，由于决策过程和环境更加复杂，后工业社会将更多地依赖新的“智能技术”，即用计算机程序、系统指令等智能技术来代替人们的直观判断，进行决策选择。

1973年贝尔正式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系统地研究了工业社会的未来，预测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后果，在美国学术界和国际未来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是未来学的经典著作。从此，“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应用。贝尔在书中写道：“本书提出的命题是：在今后30~50年间，我们将看到我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正如我所强调的：这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其结果在具有不同政治和文化结构的社会中将有所不同。”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信息产业兴起和传统产业信息化的过程，信息在后工业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贝尔在其以后的著作中也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他在1979年发表的题为《信息社会》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其实就是信息社会。”在这里，贝尔已经意识到，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革命正是后工业社会来临的突出标志。此外，后工业社会作为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工业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阶段，因此包含了动态的“信息化”的概念。虽然贝尔没有首先提出

“信息社会”的概念，但是他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和后工业社会形态和特征的描述和今天信息社会的含义基本一致，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未来世界的探索和研究。

米歇尔·福柯

米歇尔·福柯（1926～1984年），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生于法国西部的普瓦提埃，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心理学。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心理诊所工作，还在一所监狱中兼职。1954年起在很多大学中任职，1961年写出《疯癫与文明》，以后陆续发表《词与物》、《知识考古学》等重要著作。其中，《词与物》的出版引起巨大反响，为其带来巨大荣誉。福柯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对人类知识的历史所做的“考古学”研究，影响了大部分的社会科学。

《疯癫与文明》包括前言、正文、结论三部分：

前言中，福柯明确提出本书的目的是通过追溯历史上疯癫的发展史来确定疯癫与理性的本质。

正文包括九章。第一章“愚人船”，从中世纪时期众多的麻风病院开始叙述，谈到了中世纪流行的一种愚人船，这种船把疯子从一个城镇送到另一个城镇，以便让他们不断地流浪，这样城镇就可以驱逐他们。第二章“大禁闭”，叙述了17世纪广泛存在的禁闭所。第三章“疯人”，论述了17和18世纪人们对疯子的看法。第四章“激情与谵妄”，论述了疯癫的结构，福柯认为，疯癫的背后是人们对待激情与谵妄的态度。第五章“疯癫诸相”，描述了不同种类的疯癫。第六章“医生与病人”，描述了历史上治疗疯癫的各种方法。第七章“大恐惧”，描述了在18世纪中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恐惧。恐惧来源于禁闭所，人们认为禁闭所的疯子之间正流传着一种神秘的疾病。第八章，描述了自18世纪开始的、人们要求把疯子和罪犯区分开来的愿望。第九章“精神病院的诞生”，描述了精神病院的产生以及它的作用。

结论中，福柯以评论西班牙画家戈雅的多幅油画作为总结表明了疯癫的本质。

《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之前已经出版。这部著作受尼采影响很大，福柯希望自己能够在“伟大的尼采式求索的光辉照耀下”展开文化的研究。此前，他曾经写过一部《精神疾病与人格》的著作，因此《疯癫与文明》以精神病作为主题也是有原因的。

《疯癫与文明》是福柯整个思想体系的奠基之作，对于了解福柯深邃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书中阐述的理性与疯狂，尤其是对疯狂所作的话语分析和知识考古学的考证，彻底推翻了西方传统哲学所赖以生存的理性的观念。对西方思想的进一步多元化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尤其对西方的文艺理论具有重大的影响。福柯一反过去传统文论把文学看作意识形态的反映和社会状况模仿的论点，认为文学是人们的被社会排斥和阉割的话语方式的一种反映，是疯狂经验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观点促进了美国新历史主义的出现。

《词与物》主要阐述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在书中，福柯首先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承担科学话语的个人在其环境、作用、知觉能力和实际可能上无不被统治和支配着他们的历史条件所决定”。而且正是这种条件提供了认识文化和知识形态的基础。在这里，作者批判了传统的主体观，提出“人的死亡”的观点，认为人不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知识建构，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等，是对现存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形态的颠覆，它们使这些传统的知识形态“非合法化”；认为现代的哲学已经超越了追求真理、追求人的解放的境地。福柯特别批判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存在主义是“资产阶级为反对马克思而建立的最后一道防线”。接着，福柯分析了西方历史上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形态。他认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形态、古典时代的知识形态和现代的知识形态是三种不同类型。在文艺复兴时代，词与物之间以“模仿”为原则建立起联系；而启蒙运动开创的古典时代则以“同一和差

异”为原则建立起联系，这种表征系统成为语法、自然史和经济分析的基础；世界进入现代之后，在现代人文科学认知方式的影响下，人们又“返回了语言”，并且发现语言是一个“粗暴的存在”。因此，在当代，语言反映世界与存在的真实性已经越来越受到怀疑，越来越受到批判。福柯认为，古典的词与物的表征系统向现代方式的转变带来了知识系统的分裂，原本融为一体、以“科学”为名的知识体系被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系统，即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最后，福柯认为，伴随着知识系统的前进，人类的知识体系仍然会存在着分裂的可能，新的知识体系将会出现。

尼采对福柯的影响比较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福柯则指出随着上帝的死亡，“人”也必然死亡。正是在思考“人的死亡”的过程中，福柯发表了《词与物》这部纯学术著作。实际上，在1966年出版之前，福柯曾经在巴西圣保罗大学发表演讲，演讲的基础就是《词与物》的草稿，但当时反响不大。

但该书出版后，却获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该书很快变成畅销书，在三四年时间内，连续加印十几次，总印数达11万册，对一部纯学术而且极其艰深的著作来说，能够达到这样畅销的程度是极其罕见的。该书首先在学术界激起热烈反响，许多结构主义者极力推崇《词与物》，认为它带来了存在主义的灭亡，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接着，公众也热情地接受了这本书，许多人以是否拥有和读过这本书作为判断对方是否有文化的标准。

《词与物》为福柯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该书的主要贡献是研究了西方近代思想的演变，提出了自己的“话语实践理论”，从而为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反思自己的历史、思考知识的现状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